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六

最具影响力的
军事将帅

(下册)

邢春茹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邢春茹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80711 - 716 - 2

I. 影... II. 邢... III. 名人 - 列传 - 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74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960 千字 印张：110

责编：于文海 陈晓玉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6.00 元（全 20 册）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心里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

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目 录

圣马丁	1
安东万·约米尼	3
左宗棠	6
玻利瓦尔	16
温菲尔德·斯科特	18
尤利塞斯·格兰特	22
加里波第	26
毛 奇	28
阿尔弗雷德·马汉	36
卡尔·克劳塞维茨	38
费迪南·福煦	41
约翰·潘兴	44
鲁登道夫	47
卡尔·冯·曼纳海姆	51
伦德施泰特	54
约翰·富勒	58
伏罗希洛夫	62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帕夏	66
乔治·马歇尔	70
古德里安	73
切斯特·尼米兹	76
乔治·巴顿	79
朱 德	82
蒙哥马利	88

华西列夫斯基	91
朱可夫	95
刘伯承	98
叶 挺	101
贺 龙	103
彭德怀	107
叶剑英	111
聂荣臻	115
陈 毅	119
罗荣桓	123
徐向前	127
陈 赓	132
麦克阿瑟	138

圣马丁

圣马丁出生于 1778 年，卒于 1850 年，诞生在阿根廷。1786 年随父母迁至西班牙，入马德里贵族学校学习。1789 年开始在西班牙军队中学习，当过步兵、骑兵和海军；曾随军转战北非、法国和葡萄牙，参加过 1796 年英西海战和 1808 年开始的西班牙人民抗法战争，由一名士官晋升为中校指挥官。1808 年加入以解放美洲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劳塔罗社”。1811 年脱离西班牙军队，回阿根廷投身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战争。1813 年，奉命转赴图库曼，接任北方军司令。他根据敌对双方特点制定了解放南美洲的新战略方案，变北上为西进，即停止进攻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统治堡垒秘鲁。改由阿根廷西部越过安第斯山脉，先解放智利，然后再从海上进攻秘鲁。他的主张得到了阿根廷政府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1814 年 8 月，受命赴库约省任省长，组织“安第斯山军”。1817 年中旬，率军攀越安第斯山脉，攻进智利。

圣马丁率领由 4000 多人组成的安第斯山军，分别通过四道相隔甚远的隘路前进，最后终于通过了安第斯山。智利保王军听说圣马丁的军队从安第斯山多路进入智利，皆胆战心惊。他们企图在圣地亚哥附近阻止安第斯山军，但为时已晚。

被击溃的智利保王军，在智利中部各地秘密流窜，并在南部康塞普西翁附近重新集结。沃伊金斯遂指挥军队将智利保王军残余包围起来。西班牙的秘鲁保王军决定重新征服智利，于 1817 年 12 月 9 日派遣一支远征军，增援被包围的智利保王军。西班牙人的意图是击败沃伊金斯，然后把陆军主力经海路运往瓦尔帕来索，引诱圣马丁南下增援沃伊金斯，接着一举进入没有防御的圣地亚哥；即使失败了，也可以从海上撤退。

圣马丁从他派往利马的情报人员那里得知敌人这一意图，便

提前进行了军事部署：一面派兵支援沃伊金斯，一面准备在瓦尔帕来索或圣地亚哥以南制止敌人的进攻。1818年2月12日，正值查卡武科之战一周年，圣马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正式宣布智利独立。根据敌我情况，他决定采取避敌锐气，以守为攻的战术，诱使敌军司令奥索里奥进入内地，在爱国军能施展其骑兵优势的地方与敌决战。3月19日，奥索里奥于坎查拉亚达发动了一次夜袭，爱国军失利。圣马丁指挥军队有计划地退却，于4月初撤至圣地亚哥南侧的迈普平原列阵以待，奥索里奥于4月4日夜在爱国军南侧列阵，左翼部署了骑兵，但没有纵深和预备队。

4月5日晨，圣马丁策马阵前，观察敌人的部署情况，他满怀信心地说：“奥索里奥比我想像的还要愚蠢，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了！”上午十一时，爱国军突然以猛烈的炮火准确地袭击了敌人，获得大胜。迈普战役的胜利，使智利获得完全解放，进一步巩固阿根廷的独立，在军事上为圣马丁大陆战略计划的最后实现扫清了道路。

圣马丁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军事家，他的军事策略使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备受世人推崇。

安东万·约米尼

在拿破仑时代之后的 19 世纪早期，全世界超过两代的军事领导家与军事学校的学生都在研究着安东万·约米尼的著作，他们把他的作品视为现代战争的《圣经》。约米尼在书中将战争简单地概括成了几条指导原理，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军队应该全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从而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fare）为美国内战中的将军和 19 世纪中期各个战争中的欧洲领导家们提供了进行大规模军事战争的首要理论指导。

1779 年 3 月 6 日，约米尼出生在瑞士的帕耶讷（Payerne），父亲是帕耶讷市市长。他做过短期的银行职员，十九岁入伍瑞士军队（属法国），二十一岁开始指挥一个旅作战。约米尼是一个不错的军事学生，他差不多很快就开始出版许多记录着他一些想法和发现的书籍。1804 年至 1805 年，约米尼出版了他的前四本书，这些书给法国元帅米切尔·内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 1805 年后期的奥斯德利兹战役中，内伊元帅把这位年轻的作者留做他的副官，并让他加入了自己的参谋部。

约米尼的著作给拿破仑一世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05 年拿破仑晋升他为陆军上校。后来在 1806 年的对俄战争中，约米尼加入拿破仑一世的总参谋部，并参加了耶拿和伊于罗断（Eyulaus）战役，赢得了荣誉勋章。

1808 年至 1809 年，约米尼参加了西班牙战争，虽然在那里与内伊产生了个人矛盾，可他还是担任了这位元帅的参谋长。约米尼与内伊的关系从互相钦佩转变成了公开的对抗，矛盾激化到约米尼差点辞去职务去参加俄国军队。拿破仑出面介入了此事，并要约米尼继续协助内伊，同时委任他为将军，率领军队同俄国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作战。

约米尼将军就这样在两方面军队里同时协助内伊和拿破仑。1814年，拿破仑的参谋长路易斯·亚历山大·贝蒂埃阻止约米尼晋升为师长，并要以约米尼贻误呈交报告的罪名逮捕他。罪名是次要的，可贝蒂埃虚荣自负的怨恨是约米尼不能忍受的。不想再与贝蒂埃一起作战的约米尼离开了法军，加入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军队，约米尼被亚历山大一世晋升为中将，并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作为助手和顾问与亚历山大一起共商军事。然而，约米尼拒绝直接参加后来的俄国对法战役。滑铁卢之战以后，约米尼没能说服和劝阻法国君主处死内伊。

许多法国的老朋友都责备约米尼支持俄国的行为，而其他的人却对他支持内伊而感到不满。然而被流放圣·海伦娜的拿破仑却写信给约米尼，表明了他对约米尼的宽恕，还解释说，约米尼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个瑞士人，而不是法国人。

滑铁卢战役之后，约米尼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并继续他军事著作的写作。1823年，俄国沙皇重新召回约米尼，提升他为全职将军。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约米尼组织建立起了俄国军事参谋学院，并担任未来沙皇尼古拉斯的私人教师，1828年，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中，短期指挥了瓦尔纳包围战。1829年，约米尼从俄国军队退役，1853年至1856年，除了回到俄国给沙皇的克里米亚战争提一点建议之外，约米尼在布鲁塞尔以著述他的战争观念而度过余生。1869年3月22日，这位当之无愧的战争艺术专家在布鲁塞尔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岁。

在约米尼漫长的一生里，他出版了三十余本有关战争历史与战争理论的书籍，研究的对象包括腓特烈大帝、法国大革命、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的一生。而1838年出版的《战争艺术概论》是约米尼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被美国的西点军校和其他的军事机构当作最主要的教科书来使用。全世界推崇拿破仑作为自己作战指导的军事领导家们确信，瑞士军官约米尼为他们提供了这位法国皇帝能够取得成功的作战秘诀。

约米尼的作品冗长而且难以总结概括。依据他的理论来引用同

一处原文，读者可以证调和反驳出截然相反的观点。然而约米尼仍然创作出了第一本系统分析拿破仑战争艺术并广受大家欢迎的书籍。除了作战理论，约米尼定义的战术策略等概念至今仍然被大家接受，其他一些他记录和定义的军事术语还包括：“战场”——就是战争的边界范围；“战线”——就是敌我双方的接触线。

约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强调，“步兵无疑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但步兵必须与炮兵、骑兵以及后勤完全协调作战。他还强调了军队士气的重要性与“民族精神”对野外作战士兵的支持作用。

约米尼战争艺术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建立起一套严格的、适用于不同战况、不同地形的计划与行动管理体系，每一次行动都围绕着一系列的作战计划，联合友好的军事力量，有力打击敌人的弱点，穿越敌人的战线，为下一次作战开辟有利的条件。尽管人们读完所有约米尼的作品会发现他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灵活变通，可新近越来越多研究战争艺术的人员对他充满限制的几何作战计划形式与绝对的作战条例进行了批判，约米尼的教条学说里并没有预见到人们会发明出远程快速、命中率高又可以集中火力发射的步枪。

约米尼一生都喜欢别人推崇他为军事著作的首要作家。相比大部分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基本作战原理来说，他后来的战争术理学倒是影响得久一些。有趣的是，取代他成为主要军事理论家的卡尔·克劳塞维茨和他同处一个时代，而且还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与约米尼一样，克劳塞维茨曾经撇下自己的普鲁士军队加入俄军，两者都参加了几次同样的战役，当然，还同样拥有他们自己的军事理论著作。

约米尼的战争书籍是最早被广泛传看的，可到了19世纪后期，军事学校的学生们开始转为研究意义更加深远的克劳塞维茨的哲学著作了。尽管他们的结论很相似，可是少了些固执呆板的克劳塞维茨理论变成了指挥家在战争中寻求灵活变通的首要原则。克劳塞维茨与孙子的排名之所以要比约米尼靠前，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要更长远一些，并更具有现时意义。

左宗棠

左宗棠（公元1812年~1885年），字季高，中国湖南湘阴人。1832年中举人，后三次入京会试，名落孙山，遂发誓不以进士为荣，企图“建功立业”，努力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对疆域沿革、历代兵事和农业经营亦颇有兴趣。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十分关心战局形势的变化，曾作《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诸篇论战制敌之书，推崇地主阶级改革派首领、爱国将领林则徐，愤感“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抒发了“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远大抱负。

1852年，时值太平军进攻长沙，左宗棠出山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守长沙，因“功”升知县，并加同知衔。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时，他为骆的幕僚，1856年得兵部郎中衔。1860年，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由运筹帷幄的书生，一跃而为决胜疆场的大将。同年9月，他亲率楚军自长沙赴赣、皖交界地区与太平军作战，后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督率楚军攻陷金华、富阳、杭州和嘉应州，帮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军，被封为一等恪靖伯，诏赐黄马褂、双眼花翎。1866年7月，创设福州船政局，成为洋务派人物之一。同年9月，调陕甘总督，率军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后晋太子太保衔，加一等轻车都尉、东阁大学士。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讨伐和歼灭阿古柏匪帮，迫使沙俄交还伊犁，使新疆重回祖国怀抱。1881年，左宗棠由新疆抵北京，命他在军机大臣行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同年9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事，指挥抗法军事。1885年9月5日病死于福州。

综观左宗棠的一生，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教育、科技发展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利用西方科学知识，促进中国军事力量近代化

左宗棠早年受到林则徐制造坚船、利炮以促使国防近代化的思想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取胜之道，自强之策，不仅在有赳赳之勇，而且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他还说：“查外洋之强，一则餉厚，一则令严，一则水陆器具精利。假使中国有厚饷，有精巧器械，慎择能将，申明军令行之，兵勇之强亦必不减外洋”，只有这样，“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在“求富”、“自强”的思想指导下，左宗棠亲自过问主办了三项近代军事工业；1866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于福建省闽江口岸开设了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即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从1869年至1907年共造各式轮船40只，它对海防、航运等都有一定作用；1869年创办西安机器局，仿造新式武器弹药；1873年，将西安机器局搬至兰州，命名为兰州机器局，翌年该局已能仿造西洋军器，修理改造本国枪、炮器械。这三项军事工业虽然规模大小不等，但它们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力所能及的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左宗棠继承和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人就认识到没有大炮和轮船，不能和外国作战，因此极力主张运用粤海关的收入来造炮造船。可惜当日朝野没有响应，以致孤掌难鸣。在林则徐等人先进思想和近代西方工业化潮流的推动下，左宗棠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他以东洋日本为例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指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强调必须发展近代军工。在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左宗棠的所

作所为的确是颇有远见的。其次，左宗棠兴办军事工业，是符合当时国内外形势需要的。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的海上入侵，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左宗棠认识到兵不能强，则民不能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在左宗棠等人的推动下，不但近代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对采矿、运输、纺织、商业等民用工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左宗棠办理的三个近代军事工业，在当时的战争中，特别是在抗击外来入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方面，发挥了效能。如在讨伐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战争中，由兰州机器局制造、修理的军火不断送至前线，1876年，一次便供应清军子弹2万枚，使已经装备了相当多的洋枪洋炮的清军，在攻城夺地中“深得其力”。

左宗棠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建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对近代军事人才的培养。1866年，左宗棠在筹建福州船政局时，一面派人赴西方购置机器船槽，一面在福建马尾山上，开设了我国近代的第一所海军军官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在“求是堂艺局”中，学员既学西语，又学自然科学和理工学；既学制造方面的技艺，又掌握近代海军战术和驾驶等方法。由于注意对西方科学的学习，改变了旧的军事教育的传统内容，培养出了一批适应近代军事发展的优秀人才，如邓世昌、林永生、严复、萨镇冰、刘步蟾、林泰曾、詹天佑、郑清濂等，均就读于该学堂。左宗棠是按船未造出而先培养海军人才的路子行事的。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因为左宗棠考虑到，“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传受，为永远之利也”，“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才固不可胜用矣”。对此，林则徐的女婿、船政大臣沈葆楨深有体会地说：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清政府也嘉谕“左宗棠大臣谋国，所见远大。”

总之，左宗棠在引进西方军事科学知识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序上促进了中国军事力量的近代化。

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收复新疆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以钦差大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旨在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在这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使新疆全部归回了中国的版图。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命徐占彪部严守巴里坤至古城一线，防敌北窜；命张曜部固守哈密一线，防敌东犯；命金顺部驻军济木萨前线，待刘锦棠率主力到达后，即由北部向古牧地和乌鲁木齐进攻。他根据阿古柏及其党羽兵力分布情况以及清军赴新疆作战粮运困难、千里运输线易遭敌破坏等特点，决定采取“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6月，清军主力逾越天山，7月攻击济木萨，打响了收复新疆的第一枪。遂后突袭黄田，猛攻古牧地，并乘胜收复乌鲁木齐及天山以北的大部城堡。此后，冬季来临，大雪封山，左宗棠耐心说服“急思开拔”、进取南疆的将领，明确指出“大抵进兵南路，又是缓进争战之局”令部队利用冬季，肃清残敌，就地征集粮秣，进行休整，准备次年春天向南疆进军。1877年4月，左宗棠以60个营、3万余兵力，从西北和东北两路向吐鲁蕃进攻。西北路指挥刘锦棠连克达板城、托克逊，与东北路徐占彪、张曜会师于吐鲁蕃城下，经激战，收复该城，阿古柏绝望自杀，白彦虎化装潜逃。至此，阿古柏在达板、吐鲁蕃、托克逊地区的所谓三角防御，全部被清军摧毁。在收复吐鲁蕃之后，左宗棠因天气炎热，未随即向南进军，而等至秋后天气转凉后，再进行下一战役。1877年9月，左宗棠将休整过的精锐部队组成两个兵团，由托克逊成梯次队形出发，“一月骤驰三千余里”，收复喀什噶尔等南疆八城，白彦虎等率残部逃入俄境。到1878年1月，新疆除伊犁地区外，已全部收复。

略定南疆八城后，左宗棠即全力实现收回沙俄侵占的伊犁的既定目标。他在新疆认真进行军事部署，准备以武力收复伊犁，使清廷代表在中俄谈判中，有军事力量为后盾，终于推翻了崇厚

草签的卖国条约，收复了伊犁九城等地区，为祖国保全了新疆这一块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土。

主要的军事思想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拥兵重臣，他亲自参与谋划指挥了许多战事，军事言论涉及范围也较广，军事思想富有创建。特别是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战略思想。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大高潮中，中国的边疆地区普遍发生了严重危机，特别在新疆地区和东南海疆，入侵活动极为频繁。在国家、民族遭受危机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展开了一场有关海防与塞防的国防观点之争。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因负有海防之责，并想乘机建立由他控制的北洋海军，加强其政治地位，主张国防重点在海防，不在西北边防，应放弃祖国西陲重地防御，移“西饷作海防之饷”。这些论点，在客观上符合了英、俄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新疆的需要。以左宗棠为首的一派爱国官僚，则坚决反对李鸿章以牺牲塞防来加强海防的主张，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强调先进兵新疆。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背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又说：如果专力海防，新疆“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人俄耳”，塞防不力，则又“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左宗棠年轻时研究过《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新疆识略》、《海国图志》等书，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思想，特别关心祖国安危，他坚持的海防与塞防并重、先收复新疆的国防战略观点，能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衡量新疆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客观上也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

由于左宗棠力排时议，据理辩争，以及朝廷内文祥等枢臣们的支持，清政府摒弃了李鸿章等反对的议论，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令左宗棠全权指挥“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主持收复新疆大计，遂使左宗棠的战略主张得以在内外一致的局面下付

诸实施。

左宗棠在重视塞防的同时，对海防建设也有不少出色的见解。他认为海防建设“不可一日弛也”，但必须重点设防，“如人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天津者，人之头顶；大江三江入海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顶腰膂，皆宜严为之防；……此外视如髀髀，谓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1881年10月下旬，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时值中法战争前夕。左宗棠到任后，积极筹划海防，准备打仗。首先，他增强长江防务，以吴淞口为第一道关口，以白茅沙为第二道关口，以江阴要塞为第三道关口，节节设防，阻敌深入，其次，于1884年底，派王诗正等率恪靖援台军偷渡法军严密封锁的台湾海峡，增援驻台清军抗法，稳住了台北局势；第三，整顿闽江防务，在闽江各要隘增添兵勇，构筑阻塞工事，树立铁桩，横以铁索，控制闽江航道。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在坚持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战略主张，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是可以利用的力量。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建议“练渔屯、设碉堡，筒水卒，设水寨”，“合兵勇一体”，“行坚壁清野之策”，使“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还在江苏、福建沿海大办渔团，将渔户组织起来，日夜操练，视为防海的重要力量。这与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把人民群众分散的、自发的反阿古柏政权斗争汇集成有组织、有计划的反侵略战争的做法，在利用民力的指导思想上一致的。这表明他对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有某些感性认识，这种思想远远高居于一般封建官僚所谓“防民甚于防寇”的思想之上。

主张以“慎”为本的战役战术思想

左宗棠用兵谨小慎微而又老谋深算，他年青时自比诸葛孔明，“常自署葛亮”，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毫无疑问对左宗棠军事思想基础有重大影响。二十九岁那年，曾作《料敌》、《用间》、

《善后》等诸篇论战制敌之书，阐述了审己量敌，不盲目用兵和注重后路的稳慎思想。在镇压太平军作战中，他多次强调“步步为营”；在收复新疆战役中，采取“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在平时，左宗棠常以“慎”字告诫部下，在作战中，更是提醒前敌将领“慎之又慎”；在他的函牍批札中，也常可见到“当慎以图之可以无患”、“戒慎之心，未可一刻忘也”等字句。总之，在其30多年的军事斗争中，始终主张和实行着一个“慎”字。他说，“慎之字，战之本也”，可以说“慎战”集中代表了左宗棠的战役战术思想。

左宗棠的“慎战”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审己量敌，决不贸然用兵。左宗棠在筹划战役战斗时，极为重视敌情侦察和地形勘察工作，对敌人的一举一动，包括当面之敌将领的性情、素质、用兵特点等，都要反复揣测。他认为，“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强调“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因此，只有在双方情况比较明时，他才决定是否交战。

(2) 稳打稳扎，慎于前攻后顾。在军事部署上，强调扫清前路，巩固后路，“慎于前攻，亦当慎于后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前路，他惯于采取“稳打稳扎”，每逢行军，或追击逃敌，特别是在复杂地形作战，总是派一部兵力搜索前路，没有敌人埋伏拦截，才肯前进。另一方面，左宗棠又认为“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因此，“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制，可保万全”。根据这一思想，左宗棠每收复一地，即着手巩固一地；每行军作战，总是设法防敌抄袭后路，“务使虬螽搔除，方免牵制之患”。夏忻说，左宗棠用兵时，对“未得之地慎于前攻，不可轻犯贼锋，以堕诡计。已得之地慎于回顾，不使贼出我后，顿弃前功”。

(3) 缓进急战，耽迟不耽错。左宗棠在作战指导上主张“缓进急战”。所谓“缓进”，就是战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完成周密部

署，战役准备没有完毕，宁可暂缓发起攻势，决不轻举妄动，铸成过失，所以他常说“耽迟不耽错”；所谓“急战”，是因粮糈有限，战机有变，因此一旦准备完毕，确有胜利把握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尽快结束战斗，避免被动，所以他又常说“以速补迟”。在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前后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于准备充分，因此西征军向敌发起进攻后，只耗时半月，就收复乌鲁木齐以及天山以北的大部城堡。可见左宗棠的“缓进”与“急战”密切相关，是以“全胜”为核心的作战指导之下的两个战役步骤，没有周到的准备、即所谓“缓进”，便没有速战速决的“急战”，只有“缓进”，才有“急战”。

重视物质因素和后勤保障工作

孙子认为，举兵十万，日费千金，不具备足够的战争费用、粮食、器械、车马、用具等基本条件，是无法进行战争的。C·赛奥·沃格尔森也说：“后勤就它与战略的关系而言，具有动力性质，没有这种动力，战略构想不过是纸上谈兵”。同样，左宗棠也十分重视后勤对战争的影响，无论是他出山充当幕客时，还是直接统兵打仗时，都把“用兵必先筹饷”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他在西北“剿”捻平回、收复新疆等多次战役中，亲自负责后方补给，在解决后勤供给上做出了特殊的建树。

左宗棠早期的军事活动，主要在长江以南地域，这里兵源充足，财赋收入广。但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左宗棠基本上是在西北指挥作战，与江南财赋之乡相比，不仅军饷难筹，而且一切军需“馈运奇艰”，出现了“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的窘困局面，部队有时连盐菜、马干、官兵一年关一月满饷的饷银都发不出来。很明显，“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一方面多次奏报朝廷，陈请拨饷，另一方面，以大量的精力就地解决燃眉之急，保证西北战事顺利进行。左宗棠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两条：

(1) 屯田生产，且战且耕。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陕甘军务，他根据对西北情况的考察认为，“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驻军其间，自非力行屯田不可”，提出开设屯田总局，解决一部分军粮。起初，屯田只为兵屯，以营为单位，就近指地屯收，种粮种菜，生产任务主要由老弱疲乏者担任，主力部队仍随时执行作战任务。后来，又组织了民屯，生产粮食，以便就近购粮。这样，既筹集了一部分军粮，又不至于增大当地百姓的负担，这与那些就地掠食，丝毫不顾及百姓的旧军队传统作风相比，真可谓开明进步。随着军事的进展，左宗棠率领的楚军，可以说在哪驻防，就在哪里屯田，并把屯田从陕、甘推广到新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储之急。1874年，左宗棠命令西征军的前锋部队张曜统率所部嵩武军马步十余营进驻哈密，开荒筹粮，且耕且战，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开荒二万余亩，收获净粮约九十万斤，足供张曜所部食用二个月。

(2) 精心安排运输力量。左宗棠率军出关入疆作战，所需军粮主要还是由关内供给。遥遥千里路，又多戈壁，如何才能将粮食运抵前线？选用恰当的运输工具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左宗棠曾就用马车还是用骆驼运粮算过一笔细账。他认为，从肃州运粮到哈密有二十四站、二千二百余里的路程，如以一车一夫两骡运粮，需行走三十余日，在这三十余天中，每一头骡一天需料八斤，一名车夫需粮二斤，而一辆车运粮最多不过六百斤，这些粮食只仅供一车一夫二骡吃到哈密，那还有余粮再运到巴里坤？但如果改用骆驼运粮，1人可牵管五头骆驼，骆驼耗粮甚少，“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余以济待饷之军”，所以运粮宜多用骆驼。这种见地，表现一个军事家谙熟地理天文，精于计算的素质。在左宗棠的亲自主持下，清军用驼运粮一年，节省运费、脚费甚多。除了屯田、转运之事外，左宗棠还亲自过问采运枪炮弹药，筹措款项，在陕、甘、新等地筑路筑城，制造军火，还利用西北丰富的羊毛资源，筹建了甘肃织呢总局，利用新式机器挖金采矿，还疏通河流，开渠凿井，提倡种棉植树，育蚕缫丝，整理盐务，茶务和币制。这些措施，不仅较好地解决了西北军事活动

需要和军饷不足的矛盾，保证了前线部队口粮的供应，未因后勤补给而影响作战任务的完成，而且也为巩固西北国防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左宗棠是晚清时期的一名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一方面他始终站在地主阶级反革命立场，与农民起义军为敌，他对人民是犯有历史罪过的；另一方面，他利用权力和地位，勇于改革，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军事由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晚年率军收复和保卫新疆领土，在中国近代反侵略的事业上更有成就，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不可多得的爱国将领。

玻利瓦尔

玻利瓦尔，19世纪初，南美洲北部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而进行独立战争的领袖，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委内瑞拉的民族英雄。

1783年玻利瓦尔出生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个土生白人贵族世家，父亲及祖辈都在当地极有权势。但玻利瓦尔并不愿在家人的呵护下生活。1797年1月，玻利瓦尔以士官生的身份参加了委内瑞拉民卫部队，第二年7月他被晋升为少尉。1799年玻利瓦尔结束了部队生活，前往欧洲学习和旅游，在此期间，他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此后他的一生都在为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独立事业而奋斗。

1807年玻利瓦尔从欧洲回到委内瑞拉，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1810年他参加了委内瑞拉人民发动的武装起义，并作为新政权的代表出使英国，以寻求英国对他们的支持与援助。1811年委内瑞拉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告独立，并成立了第一共和国，玻利瓦尔被任命为卡贝略港要塞司令，带领共和部队与外来侵略势力及国内反动分子进行斗争。但是一年之后，第一共和国就遭到颠覆，共和政府被推翻。

为了重建共和，玻利瓦尔组建了一支一千余人的部队从新格拉纳达打回委内瑞拉，收复了加拉加斯，建立了第二共和国。因此他被人民誉为“解放者”，并出任委内瑞拉共和军总司令。1814年，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手进攻下，第二共和国也被颠覆，玻利瓦尔出走牙买加和海地。在海地，玻利瓦尔总结出了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的巨大失误。

1816年，玻利瓦尔在海地革命者的支持下，又组成一支军队回到委内瑞拉。这次他没有首先攻打大城市，而是建立农村武装，宣布解放黑人奴隶，并从奴隶中招募士兵，组建部队，并答

应给革命的战士分配土地。1817年和1818年，玻利瓦尔的部队渡过了接连失利的困难时期，终于抵住西班牙军队的进攻，平定了内部叛乱，并联合平原地区的游击力量，在委内瑞拉东部建立了以安格拉图斯城为中心的基地。1818年，玻利瓦尔主持召开了国民议会，并宣布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成立。1819年，玻利瓦尔率军出征新格拉纳达，在一年之中解放12个省，1820年8月7日波哥大也得到了解放。同年12月17日，安格拉图斯国会决定将原委内瑞拉都督区和新格拉纳达总督区合并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玻利瓦尔当选为总统，并统率三军。1821年初，玻利瓦尔挥师东进，在6月24日取得了卡拉沃沃会战的全面胜利。

他认为，“此次辉煌胜利确认了哥伦比亚共和国在政治上的诞生”。1822年5月，统一的六哥伦比亚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南美洲北部独立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玻利瓦尔不仅是一个民族英雄，同时还是一个极为高尚的国际主义者。在把委内瑞拉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后，他又开始投身于全美洲的民族解放事业中。1822年，玻利瓦尔率领哥伦比亚军队开始南征，同年4月在邦博纳之战中他率领部队重创西班牙军。1822年中期，玻利瓦尔同北上解放基多的苏克雷部队胜利会师。1824年8月，玻利瓦尔指挥的胡宁之战获胜，为解放利马奠定了基础。由于哥伦比亚国会牵制，玻利瓦尔不得不于1824年10月交出全部军权。但苏克雷遵照玻利瓦尔的指示，于同年12月以不足6000人的兵力和约一万人的西班牙殖民军主力在阿亚库乔高原进行决战，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大获全胜。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它标志着西班牙在南美洲统治的终结，秘鲁总督殖民军的四个元帅、十大将军全部投降。1825年，秘鲁解放。为了纪念玻利瓦尔，该地独立后，定国名为玻利维亚。1826年1月，卡亚俄港的西班牙驻军投降，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宣告结束。

玻利瓦尔以毕生精力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他领导的独立战争解放了南美洲相当于今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拉丁美洲建立共和制度和促进美洲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温菲尔德·斯科特

在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军事领导人无疑是温菲尔德·斯科特。斯科特是个活跃的将军，他是美国军事历史上在职时间最长的将军，领导军队超过二十年。他对军事领导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对胜利和训练之间相互关系的洞察。

1786年6月13日生于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附近自己家族的月桂枝庄园，斯科特在独立学习法律之前在威廉·玛丽法学院学习。短暂的在学院逗留后，他于1807年加入了当地的一支骑兵队伍，使他后来得到一份在正规军中担任炮兵的工作。斯科特早年穿军服的日子不是很成功。至少有两次他考虑过辞职重返法律业。从1809年到1810年斯科特在新奥尔良服役，在那里，他指控他的长官詹姆士·威尔金森将军是个“叛国者、说谎家、流氓无赖”。虽然斯科特的评价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指控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并从现役停职一年。

斯科特的第一次战斗经验并不比他平时服役更有教益。在1812年战争开始时，已经是陆军中校的斯科特，加入了试图从纽约北部入侵加拿大的美国军队。1812年10月13日在皇后镇高地公园战役（Queenston Heights）中，英军俘虏了斯科特，并在交换战俘前把他囚禁了三个月。

1813年，斯科特指挥了一场对福特，乔治（Fort George）的成功袭击。在从袭击的伤亡中恢复过来以后，斯科特参与了对蒙特利尔并不成功的进攻，在那里他找到了美国军队的问题所在：民兵训练素质差，挑选的军事领导人更看重乡谊而非能力。

1814年3月，已经是准将的斯科特建立了一套保持了二十五年的领导风格。他开创了一场严厉的训练方式，包括反复进行一

系列的军事操练。他强迫进行循环训练，对着装和行为方面有诸多规定，因此得到了“老古板”的绰号。

作为1812年战争的幸存者，斯科特所带的旅赢得了他们该得的荣耀。1814年7月5日，他的军队在齐佩瓦（Chippewa）打败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英国军队。不到三周的时间，这支旅又抵抗了英军主力在兰迪道之战的进攻，斯科特再次严重受伤。战争结束时，斯科特被提升为少将，不仅赢得了军界的尊重还受到普通美国民众英雄式的欢呼。

在这场战争以后，斯科特参与到改造战后军队，融合在战场上的经验编写军队的第一本标准训练手册。他还两次访问欧洲，从别国学习军事组织和各种训练方式。

在1812年战后期间，斯科特证明了自己进行谈判与训练士兵同样拿手。1832年他通过磋商签订的协议避免了与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的战争，在1838年和1839年两次解决了新英格兰—加拿大的边界纠纷，这场纠纷有导致大不列颠与美国之间第三次大战的危险。1838年，斯科特还监督切罗基族从乔治亚州迁移到后来成为俄克拉荷马州的保留地。

在这期间，斯科特一直保持直率的性格，常常与国会议员和总统的政治议程发生冲突。尽管如此，他的正直和领导才能还是继续得到公认和嘉奖。1841年7月5日，斯科特接管了整个军队，这个职务他担任了二十年，并且利用职务之便继续发展纪律与军事训练和战术的标准化。

1846年墨西哥战争爆发，斯科特最初留在华盛顿让圣扎迦利·泰勒将军领军入侵墨西哥。虽然泰勒在墨西哥北部赢得了几场战术性的战役，斯科特还是意识到美国要赢得完全的胜利，就必须把战场推进到墨西哥腹地，包括他们的首都墨西哥城。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虽然不愿意增加斯科特受民众的欢迎度，因为害怕他会成为自己政治上的对手，但最终还是授权将军接管战场上的全部军队。

1847年4月8日，斯科特和他的侵略军在韦拉克鲁斯实施了美国第一次重大的两栖登陆作战，并且以最少的人员损失攻占了

该港口城市。迅速向内陆推进，4月18日，斯科特在塞罗戈多（CerroGordo）遭遇并打败了一支由山塔·安娜率领的人数更多的墨西哥军队。虽然补给线拉得很长，又是山区地形，他的军队还是在占领了普韦布洛（Puebla），并随后在八月和九月分别赢得了孔特拉斯（Contreras）、梅林诺·德拉·雷（MolinodelRey）和查布尔特佩克的几场决定性战役。援助斯科特并学到有用的策略运用于以后的战场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军官，包括罗伯特·爱德华·李，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还有超过一百位别的后来在内战中成为北方部队或南方联盟军队将军的年轻军官。9月14日，在历经五个月的连战连捷，斯科特占领了墨西哥城。胜利使美国得到了更多的土地，从德克萨斯州到加利福尼亚，构成了美国三分之一的版图。

斯科特一直作为军政府的首长待在墨西哥城，直到1848年4月回国并成功地回击了波尔克总统对他私生活和财政方面不正当行为的诬告。作为军人他虽然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斯科特转到政治领域做得并不好，没能获得辉格党的提名参加1848年的总统竞选。四年后他获得了提名，但是在 대선中大败给了富兰克林·皮尔斯。

在他从政期间，他被获许保持现役军职，斯科特并没有忽略从在墨西哥学到的经验教训中继续改进军事训练。在帮助解决1859年另一次美英之间普吉特桑德（PugetSound）的圣胡安岛边界纠纷时，他的谈判技巧仍然保持锐利。

到1861年，斯科特为他的国家服务了五十多年，经历了两场战争。尽管出生于弗吉尼亚，在内战爆发时斯科特还是效忠于他的国家。斯科特是少数认为美国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平息叛乱的人之一，事实上，他制定了一项计划，即通过广泛的动员，封锁南部，迅速从密西西比河撕开联盟的缺口。将军的“蟒蛇计划”受到北方媒体、政客和年轻的军官的嘲讽和奚落。报纸把斯科特描述成常常在办公桌前就睡着的年迈老人。

1861年11月1日，斯科特退休，联邦军队统帅权移交给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斯科特活过了内战，看到他的计划最终

被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采纳并获得成功。他于 1866 年 5 月 29 日在纽约的西点军校去世，距他的八十岁生日只有几天。

从战场的前线到国会大厦的大厅，斯科特指挥和塑造了美国军队半个世纪。他的勇敢、无畏和组织才能把一支初生的军队带到了快要跻身世界强国的地位。尽管现在不如格兰特或是李有名，斯科特是他们俩的良师和领导。他的重要性超过他们俩，因为他在职时间长，但是他排在带领美国赢得独立的华盛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级将领之后，这些高级将领打败轴心国赢得胜利，并确定了美国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地位。

尤利塞斯·格兰特

在美国内战联邦军队打败联盟军的过程中，尤利塞斯·格兰特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的战略战术谋划能力证明了他优于他的主要对手，罗伯特·李。尽管因为有重大人员伤亡的经历，格兰特常被描述成醉鬼和屠夫，但是他理解将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投入整体战争的重要性。格兰特取得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无论格兰特的平民生活还是军事生涯都不是一开始就引人注目的。他在 1822 年 4 月 27 日出生于俄亥俄州快乐镇的一个制革厂主家庭，是六个孩子中最大的，格兰特在 1839 年接到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入学通知。在向西点军校报到时，格兰特决定将他的名字从海勒姆·尤利塞斯改为尤利塞斯·海勒姆以避免首字母缩写“HUG（拥抱）”带来的尴尬。一次国会议员提名他竞争学院奖犯了行政上的错误，误将他的名字报成尤利塞斯·辛普森。为了避免以后的混淆和繁琐，格兰特没有费力去修正这个错误，欣然变成了 U. S. 格兰特（双关语：美国的格兰特）。

格兰特在西点军校并没显示有很大的潜力，他在 1843 年那届毕业的三十九名军校学生中排在第二十一名。虽然在学校格兰特的马术是最出色的，但是这位新的陆军中尉被分在了步兵团，并在毕业后，到密苏里州的杰弗逊兵营第四团报到。

1846 年墨西哥战争爆发，格兰特和随他所在的团在格兰德河边界加入了圣扎迦利·泰勒的队伍。格兰特参与了这场战争早期的几场战役，在蒙特雷战役（Monterrey）因为勇猛善战而受到了表彰。1847 年他所在的军队转到南方加入由温菲尔德·斯科特领导的一场入侵韦拉克鲁斯的战争。这场战争中格兰特在四月参加了塞罗戈多战役，八月参加了丘鲁布什科（Churubusco）战役，九月参加了梅林诺—德拉—雷和查布尔特佩克战役。攻陷墨西哥

城时，格兰特已名誉晋升到上尉，正规军晋升到中尉。

格兰特在 1848 年回到密苏里州，娶了当地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朱莉娅·登特（Julia Dent），他是在早前分配到杰弗逊兵营时认识她的。频繁的换防把格兰特带到了密西西比州，纽约州，密歇根州和太平洋西北部。1854 年，已经是正规军上尉的格兰特到加利福尼亚的福特洪堡报到，因为他的妻子不能随他去赴任，格兰特开始——据一些记录说是继续——酗酒，其后很快他就放弃了他的职务。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格兰特回到密苏里州尝试过农业和各式的商业冒险。但是一样都没有成功。1860 年他把家搬到了伊利诺斯州的加利纳，并在他父亲的皮革店里做职员。

内战爆发时，格兰特试图在常规军中重新获得一个职务，但是尽管大规模的动员，军界还是没有对他表示太大兴趣。最后，格兰特终于获得一个上校职位担任伊利诺斯第二十一志愿步兵团的指挥官，不到两个月时间，他就被提升为准将指挥密苏里州东南区。

格兰特的第一次在内战战场赢得有限的胜利是在密苏里州的贝尔蒙（Belmont）。他并没引起林肯总统和正规军的注意，直到他极其漂亮地将海军和陆军相配合于 1862 年 2 月占领了联盟军的亨利和达那逊（Donelson）堡。格兰特在达那逊堡战役时要求叛军指挥官的话成了他的昵称：“无条件投降”格兰特。

1862 年春，格兰特被提升为少将，并掌管田纳西州的军队。4 月 6 日，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将军（Albert Sidney Johnston）率领联盟军队突袭了田纳西州夏伊洛的联邦军队，但是，格兰特重整他的队伍对叛军进行了反击。

在夏伊洛之后，格兰特指挥了几次机动作战，展示了他对战场战术的掌握。运用快速行军和攻击性行动，格兰特在他的军队向维克斯堡行进过程中，在密西西比州对超过己方人数的敌军五战五捷。格兰特再次用美军海上舰队在密西西比河上配合他的进攻，并在六月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维克斯堡（Vicksburg）。这座城市在 7 月 4 号向格兰特投降，使联邦军完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

并成功地将联盟军从地理上切断为两个部分。

在维克斯堡一役后，格兰特终于在美国正规军中获得任职，被提升为少将，并任新成立的密西西比师的指挥官。他迅速地控制了查塔努加（Chattanooga），冲破了叛军的围城攻势，在鲁克奥特山赢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胜利后格兰特并未休整，而是乘胜追击撤退的叛军。

林肯总统三年来一直在寻找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将军。1864年他认定格兰特就是他在寻找的那个统帅，9月他提升格兰特为中将任命其为联邦军的总指挥。正规军的军官们对格兰特没有好的印象，普通的市民听到的都是他酗酒的故事，对此，林肯只是简单的回应，“我需要这个人，他作战英勇”。

那也正是格兰特所做的。他很快就接管了统帅权，在战场上用电报指挥了整个联邦军取得成功。意识到南方比不上北方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格兰特开始把一连串的行动建立在损耗资源上（对温菲尔德，斯科特早年蟒蛇计划的继续与延伸）。他一面命令威廉·T·谢尔曼向亚特兰大推进，菲利普·谢里丹压制申南多亚谷的叛军，一面自己同波拖马可河（Potomac）乔治·米德（George Mead）的军队一道抗击瑞奇蒙德（Richmond）和李在弗吉尼亚的部队。虽然经历了一系列血腥的荒原战役、斯巴萨维利亚战役（Spotsylvania）和冷港战役，结果格兰特并没在这场战争中获取必需的胜利。事实上，李足以与他匹敌，并在某些情况下领导才能胜过他。但是联盟军继续损失人员，又不能得到补给，他们只能被迫应付格兰特的进攻而不能自己主动发起进攻。

1864年6月，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彼得斯堡包围了李的部队。此时1865年4月1日，格兰特在五岔口战役（Five Forks）中取得胜利威胁到李的右翼防守迫使他撤退才告结束。格兰特与李的西撤军队平行，并命令谢里丹切断他们的撤退路线。4月9日在阿波马托克郡府，李认识到他已经无力再战，于是向格兰特投降。剩余的南方叛军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也跟着投降了。

格兰特在战后一直留在军中，1866年，国会批准将他提升为四星上将，这是自1799年来唯一一次这样的提升，1868年格兰

特赢得了他两次竞选中的第一次，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被一系列的丑闻摧毁，用人不善，卷入欺诈的丑闻，虽然不是格兰特本人这样做，他的总统生涯证明了他是个更好的将军而非政治家。

在经过 1879 年不成功的第三次竞选活动后，格兰特搬到了纽约。他很快证明了他的商业技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长进，他在一次银行业投资中损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在被诊断出患有喉癌后，格兰特用生命的最后时间来写自传，并在他去世前四天才完成。他于 1885 年 7 月 23 日在纽约的蒙特葛瑞格（MountGregor）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这本自传很成功，版税足够支持他家庭未来的生活需要。

格兰特矮壮、结实、肩膀浑圆，他的军人风度从未给任何人留下过深刻印象。尽管几乎别的尝试都失败了，他仍然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他的人员伤亡名单很长，也确实常常饮酒过量。不管怎样，他赢得了美国历史上最大、最关键的一场内战，保证了联邦的存在和奴隶制度的废除。

虽然不像李一样受人爱戴，不像 J·E·B 斯图尔特或菲利普·H·谢里丹一样炫耀，格兰特向世人证明了林肯对他的军事任命是正确的，他就是在那个适当的时间里的正确人选。现代的“总体战”和美国的统一是他留给世人的遗产。没有他的领导，美国很可能会陷于分裂，不会上升到今天的超级大国地位。

加里波第

具有卓越军事天才的加里波第，在政治上却过于浪漫天真，对于身边的种种阴谋诡计，权力欲望、党派纷争，他感到厌烦无奈。他那高贵无私的纯洁的心灵中，只有一个想法：统一意大利，一切为了祖国。他宣布两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把一切权利移交给埃马努埃莱国王。

至此，除罗马和威尼斯之外，意大利全国基本统一。国王派人送来一份礼单：给他一处王宫古堡，一艘汽艇，给他的长子梅诺蒂一座庄园，委任他的次子里乔蒂为御前侍从武官，给他的女儿泰雷西一份丰厚嫁妆。“我奋战南方，既非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牟取私利。我急欲回去过我的孤独生活。”他不仅谢绝了礼单，而且辞去正规军中的官阶，带着未能进军罗马的遗憾和仅有的 50 法郎及一口袋菜豆种子，回到卡普雷拉岛。

1861 年 3 月 14 日，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正式登基，意大利王国成立了。此后 20 年，内阁的权力斗争此起彼伏，国际矛盾风云变幻。这段时间，加里波第以为自由而战的传奇将军和耕种渔猎、造福于孙的一家之长的双重角色，有时活跃在欧洲大陆，有时幽居在海上小岛。

只要祖国需要，他会立即不计前嫌，二话不说，立刻组织志愿军奔赴前线。他带兵参加 1866 年的普奥战争，意大利作为普鲁士的盟友收回威尼斯，他再次为彻底统一祖国立下汗马功劳。1867 年，他远征罗马失败，又于 1870 年委托助手组织志愿军进军罗马，和正规军一起推翻教皇国，收回罗马，最后统一了意大利。

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加里波第不仅成为解放祖国的元勋，意大利的民族英雄，而且也成了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一面旗

帜。1861年，美国大使代表林肯总统正式邀请他去美国统率部队。1863年，当他因向罗马宣战而被捕时，全欧洲掀起了愤怒的浪潮，英国爆发抗议游行，德国募捐铸造金冠赠给他，瑞典举行群众示威，法国派出慰问团。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当得知法国推翻了拿破仑三世建立共和国时，他主动请缨，指挥八千沃捷兹军队，打败了普鲁士名将维尔德的二万大军。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时，他接到担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邀请。但是他已百病缠身，不能成行。日愈剧烈的风湿病和原因不明的发烧、疼痛，无情地折磨着这位戎马一生的传奇英雄。

卡普雷拉岛上，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坐轮椅的老人。有时他在女儿的墓地一坐半天，有时他扶着一块碑石喃喃自语，那下面埋着他的战马。晴朗的夜晚，他会用望远镜观看划破夜空的彗星，沉闷的下午，他多半呆在房间里，与镶在紫檀木镜框中，那条阿妮塔留下的乌黑发辫作伴。一天，他让人抬着来到海上，望着碧波万顷的大海，他轻轻抚着刚刚几岁的小儿子说：“小家伙，我希望你当海军。”

1882年6月2日，被恩格斯誉为意大利最后一位具有古风的英雄与世长辞了，他安息在小岛家庭墓地的几棵松树下。意大利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名字：朱塞佩·马力亚·加里波第。

毛 奇

普奥战争以后，毛奇立即着手制订对法国作战的宏大计划和进行战争准备。北德意志各邦虽然统一了，但是南德还有四个邦国处于法国的卵翼之下。要完全统一德国，势必要与法国一战。而且作为一个军人，他个人的成就因为法国的干涉而打了折扣，心里一直忿忿然。所以于公于私，这一箭之仇都非报不可。

毛奇是一个知识全面、头脑冷静、目光锐利的军事家，就在普奥战争进行之中他已经发现了普军不少弱点。普军上下对骑兵的作用都认识和发挥不够，在普军翻越苏台德山脉时，他和下级指挥官都未派骑兵在前面警戒和侦察，行军处于一种盲目状态，结果在冲出山垭口时与奥军发生了遭遇战。如果奥军在山中或山垭口设伏，普军将吃大亏。此外，对骑兵屏护主力、阻滞敌军行进、反侦察等作用也未能发挥。

毛奇还发现普军炮兵武器和战术上都存在严重缺点。普军使用的大炮，很多还是前膛装填的滑膛炮，这种炮被证明比奥军普遍使用的后膛装填的线膛炮，在发射速率和准确度上都差得多。在战术上，普军习惯把炮兵放在行军纵队的尾部。所以当普军第二军团前卫部队从山垭口冲出与奥军遭遇时，就完全失去了炮火的保护。更为严重的是，当第一军团在萨多瓦向奥军正面发起进攻时，出现炮火支援迟缓的问题，普军步兵完全暴露在奥军火力之下，受创严重。

针对这两大弱点，毛奇在战后立即着手改革，将普军火炮全部更新为钢质、后膛装填的线膛炮，并对炮兵和骑兵指挥官进行新编队和新战术意识的培训。毛奇率先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即炮兵的预备队就是弹药。从此，普军在战斗中总是将所有能用上的炮兵都及早投入战斗。

经过毛奇几年的努力，普军在 1870 年投入普法战争时，无论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思想等方面，都远比法军准备充分。

在普鲁士人忙乎的时候，法国人也没有闲着。普奥战争一结束，拿破仑三世就眼巴巴地盼着俾斯麦答应给他领土“赔偿”的诺言兑现。谁知望穿秋水，俾斯麦一声不吭，就像压根儿没有这回事。拿破仑三世知道受了骗，心中极为不满。普鲁士人得寸进尺，又搞起了一个北德意志联邦，赫然一个大国屹立，法国要想再次称霸欧洲，可就遇到强硬对手了。拿破仑三世痛下决心，决不再姑息遗患，尽快以战争削弱普鲁士，阻止德国统一。

双方都在大规模地扩充军备，同时展开秘密的外交活动，孤立敌人，争取盟友。俾斯麦竭力想争取英、俄中立，拿破仑三世则力图拉拢奥地利、丹麦和意大利，组成反普同盟。老奸巨猾、巧舌如簧的俾斯麦显然比公子哥儿出身的法国皇帝技高一筹。俾斯麦颇有成就，拿破仑三世却接连碰壁，搞得臣民怨他无能，颇有要闹事的架势，逼得他只好尽早动武。

到 1870 年，普鲁士首先做好战争准备。可一时没有借口。按照俾斯麦的信条：只要需要，没有就去制造。俾斯麦眼睛滴溜溜一转，发现西班牙是个空子。原来的女王伊莎贝拉被 1868 年的革命推翻后，王位至今空着。俾斯麦派人秘密去马德里，收买西班牙临时政府，让他们邀请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亲王去当国王。这事俾斯麦、毛奇、罗昂一伙人事先没有告诉普王，他们怕威廉反对，阴谋就搞不成了。

果然，7 月 3 日西班牙《回声报》披露利奥波德出任西班牙国王的消息后，正在埃姆斯温泉疗养的威廉国王闻讯大为惊讶，并立即表示反对。但反应最强烈的还是拿破仑三世，他简直跳了起来，一面向普鲁士提出抗议，一面扬言：谁敢派人去西班牙当国王，就同谁开战。事情明摆着，他要让那个普鲁士人去做了国王，岂不是让人家两面夹攻吗？

7 月 9 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赶往埃姆斯谒见普王，要求制止利奥波德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表示他将劝阻亲王接受邀

请。利奥波德也随即发表声明，不去西班牙做国王。事情到此本就可以了结了，但是拿破仑三世还不放心，竟命令大使去向普王逼索永远不同意利奥波德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书面保证。这就做得太过分了，威廉毕竟是一国之君，岂能做这种丢脸面的事。他拒绝了大使的要求，并将会谈结果电告首相俾斯麦。

俾斯麦收到电文时，正同总参谋长毛奇和军政大臣罗昂共进晚餐。俾斯麦看了电文，诡谲地笑了笑，问：“对法国的战争早打好还是晚打好？”毛奇以他一贯的简洁语言回答：“如果真要打，晚打对我们不利。”俾斯麦于是提笔在电报上改了几个字，将原来比较温和的语气改成带有侮辱法国皇帝的意味，他一面将改过的电文递给毛奇和罗昂，一面说：“那头高卢牛看见这块红布会立刻激怒起来。”三人大笑。他们虽然知道这会引得国王龙颜大怒，但一个统一的德国足以平息他的怒气。这三个战争贩子对于德国的统一，实在比国王本人还要热切。

经过删改的电文在报上一发表，法国舆论大哗。拿破仑三世气急败坏，觉得受了侮辱，但也高兴有了发动战争的借口。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正中俾斯麦、毛奇等人的圈套，他们正是要法国先进攻，这样普鲁士便处于民族防卫战的地位，有利于争得德意志民族的支持和国际舆论的同情。

法国为这次战争也进行了多年的准备，陆军大臣向皇帝一再吹嘘说，完全准备就绪。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急忙调兵遣将，想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越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方向突袭，切断南北德意志的联系，强迫各邦国中立，然后联合奥地利和意大利直攻柏林。同时，舰队在波罗的海和易北河配合陆军行动。

皇帝的战略计划本也不错，可他的军队实在不争气，平时训练差，装备落后且不齐全，参谋指挥系统效率低。部队接到集中命令时，到处乱成一片，有的将军甚至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地图没有，军需品不足，索要粮草、弹药、帐篷的电报纷纷飞向巴黎总部。7月28日，对此一无所知的皇帝兴冲冲跑到梅斯前线，准备发动进攻，这才发现没有一支部队完成战争准备。又耽误了一

个星期，法军才于8月2日开始进攻。

普军却利用这段时间迅速动员和集中起来。在毛奇效率很高的总参谋部的指挥协调下，普军三个主力军团，连同预备队和机动部队共40万人，在十天之内便全部集结于西南边境一带。毛奇侦知法军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分别集中兵力，便将三个军团配置在法军两部之间、孚日山后面从北到南一线，这样三个军团既可以互相支援，也可以集中力量攻击敌军一部。

8月2日，法军主力莱茵军团的三个军从梅斯向德国境内的萨尔布吕肯突进，普军一部受冲击，被迫后撤。毛奇立即命令第一军团向第二军团靠近，第三军团向南突击，阻止斯特拉斯堡一线法军北上增援。8月4日，普军开始全面反攻。

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率领第三军团共13万人向南前进，在维桑布尔附近越过国境，歼灭了一个埋伏在那里的法国师。8月6日与麦克马洪元帅统率的法军南线军团六个师接战，将其击退，同一天，普军一、二军团在福巴克击溃法军第二军一部。

普军这一系列攻势迅猛而凌厉，尤其是改进后的炮兵，双方步兵尚未靠近便以猛烈的火力向敌军轰击，给法军造成大量死伤，严重打击了法军士气，在普军步兵进攻时又提供连续不断的炮火支援。战斗中，普军无论在炮兵火力、步兵火力的配合上，都明显强于对方。法军被这一连串的打击弄得手忙脚乱，梅斯的大本营里一片惊恐气氛。拿破仑三世见形势不妙，立即把帅印交给巴赞元帅，自己坐上马车慌忙往西逃往夏龙。8月9日，麦克马洪留下一部坚守斯特拉斯堡，自己带领其余南线部队乘火车撤往夏龙。

毛奇从骑兵侦察队那儿及时掌握了法军动向，命令第一军团直趋梅斯；第二军团插向梅斯与南锡之间；第三军团从南锡向西前进，从侧翼包围法军。8月中，向西挺进的第一、二军团以骑兵为先头部队进行快速迂回，在格拉夫洛特以西截住了从梅斯往凡尔登退却的法军。8月16日，普军挫败法军往马斯河方向突围的计划，迫其在格拉夫洛特设防。8月18日，两军在格拉夫洛特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十几万军队，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到傍

晚，普军击败法军，攻入格拉夫洛特，迫使巴赞率领 18 万法军撤回梅斯要塞。普军乘势围城。

毛奇原计划没有设想法军主力会退守梅斯。法国人拙劣的战术使他喜出望外，他立即集中第一、二军团大部共 15 万人，由弗里德里希·查理士王子指挥围攻梅斯，将巴赞钉死在这里。其余部队另组一个缪斯军团，配合第三军团向巴黎进发，迫使法军在巴黎以东地区会战。

此时，麦克马洪元帅在夏龙又重新组成了一个新军团，共 13 万余人，他决定退守巴黎。8 月 21 日，部队出发不久，麦克马洪接到大本营电报，要他火速驰援正在突围的巴赞部队。麦克马洪被迫回师东进。8 月 26 日，麦克马洪向北绕道迂回到色当以南地区，避开从南锡往西北前进的普军缪斯军团。

毛奇从骑兵侦察队那儿得知麦克马洪正向梅斯开进，一时颇为疑惑，难道法国人连首都都弃之不顾了吗？因为巴黎方面已经没有防卫部队了。8 月 29 日，他从被俘的法军参谋人员口中得知确切消息，立即命令缪斯军团和第三军团向北疾进，阻止麦克马洪渡过马斯河。

麦克马洪在途中得知巴赞仍被围在梅斯，普军两个军团又渐渐逼近，知道救援巴赞已无可能，为免全军被困，唯一出路是向北撤退。但拿破仑三世不甘心放弃梅斯，法军主力，命令麦克马洪继续东进。法军指挥混乱，命令反反复复，搞得部队疲劳而沮丧，而且也错过了战机。

8 月 30 日，普军先锋部队赶到，随即发起袭击。法军正在进食，措手不及，受到重创。当晚，麦克马洪命令部队进驻与比利时接壤的色当要塞。拿破仑三世也进入色当。

毛奇命令缪斯军团越过马斯河，抢占通往比利时的阿登山口，从北面和东面包围法军，第三军团截断法军往巴黎的退路，从南面和西面发起进攻。8 月 31 日，普军从四面向色当附近的法军发起猛攻。毛奇对普王威廉说：“近卫师开始进攻了，我祝贺陛下取得本世纪最伟大的胜利。”经过一天激战，法军被压缩在要塞周围一片狭小的地域内。黄昏时分，毛奇观察着地图，见合

围已经完成，不禁得意地说：“现在我们把他们关在一个老鼠笼子里了。”

色当城周围小山环绕，法军驻扎城内，位置极为不利。麦克马洪当初退至色当，并不打算在这里组织防守，不过想休息两天，然后往西南撤退。没料到普军进军如此神速，两夜之间便使他成了瓮中之鳖。

9月1日凌晨，大雾弥漫，法军迅速占领阵地，准备抗击普军进攻。普军155000人已进驻前沿，占领了周围几乎所有高地，七百门火炮一齐对准色当城。俾斯麦和普王站在一个离色当只有三公里的小山上，用望远镜俯瞰着雾气笼罩的色当城，等待着欣赏胜利的全过程。

不久，雾气开始消散，色当要塞的轮廓渐渐显现出来。毛奇下令总攻，七百门大炮一齐怒吼，炮弹像雨点般落在法军的阵地上和城内的房屋上，到处是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和熊熊大火，法军士兵争先恐后往堡垒里乱钻。上午七时，法军总指挥麦克马洪元帅在视察前沿阵地时被炸成重伤，被迫交出指挥权。当时法军还控制着城北一处高地，这是法军唯一可能的退路。可是法军将领们却在是否突围的问题上发生争吵，普军趁机攻占北部高地，将十余万法军全部装入袋中。此后，普军采取联合火力，集中炮火进行压制性射击，猛烈的炮火时而转向东侧，时而移向西部，轰得法军士兵不知所措，惊恐乱窜，互相践踏，死伤累累。色当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

拿破仑三世绝望地躲在地堡内，称霸欧洲的雄心壮志已然灰飞烟灭。他反复考虑，实在不愿意享受一个皇帝战死的罕见的光荣。下午三时，他下令在中央塔楼上升起白旗，并派人向普王递交了求降书。9月2日上午，拿破仑三世在童雪里村会见俾斯麦，法军正式投降。

至此，色当战役结束。此役法军死伤一万七千余人，被俘十万三千人，其中包括法国皇帝、元帅和39名将军。此外还交出各种火炮550余门，车辆一千余辆，战马六千匹。色当战役是一个典型的完全的包围战，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

十分深远。

随后，毛奇指挥普军长驱直入，继续向巴黎推进。这次他决心贯彻他的信条；政治不得妨碍战争的进程，直至战争结束。他决心不让任何人使他的胜利再打折扣。

法军战败投降和普军继续入侵的消息传到巴黎，人民群众异常愤怒，以革命推翻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此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的王朝统治时代。

9月19日，普军进围巴黎。9月28日，被围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军投降。10月28日，被围在梅斯的巴赞元帅投降。普法战争结束。

普法战争是十九世纪最大的战争之一，双方共投入兵力70多万人，火炮近三千门。这次战争是毛奇最成功的军事杰作。他在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了解了法军的组织、装备、训练和运输能力等所有情况，领导总参谋部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并吸取了普奥战争的教训，对炮兵武器、战术及骑兵战术进行了革新，使炮兵和骑兵在整个战争尤其是色当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切实不懈的努力，使普军无论在兵力、火力、机动能力和战术上都明显优于法军，从战争一开始便占据了压倒优势。毛奇的指挥巧妙果断，随机应变，几乎无懈可击。由于他在普奥战争中树立了威信，指挥官们信任和服从他的指挥，也使得他的战术意图得到完全的实现。

普鲁士对法战争的胜利，把南德意志几个独立的邦国吓坏了，赶忙于1870年底发表声明，宣布加入德意志联邦。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王宫正式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并自封为第一任皇帝。德意志经过近六百年分崩离析的时代，终于统一成为一个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

1月28日，巴黎“国防政府”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解散全部法国正规军。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初步和约，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了正式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东洛林给德国，并赔款50亿金法郎。

威廉坐上了德意志皇帝的宝座，眉开眼笑，踌躇满志，对俾

斯麦、毛奇一伙愚弄他的恼恨早已烟消云散。他在庆功宴会上说：“您，罗昂将军，磨亮了宝剑，您，毛奇将军，使用了宝剑，您，俾斯麦伯爵，多年来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当我感谢军队时，就特别地想到你们三位。”

当然，这完全是颠倒主次的胡说八道。真正导致德国统一战争胜利的，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德国的民族运动，是德意志人民英勇奋战的结果。毛奇，俾斯麦等人不过是历史偶然选中的工具而已。

普法战争的胜利，使毛奇的声誉大增，他被公认为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军事家。1871年，他因功晋升元帅，赐封伯爵，并得到议院的大笔金钱奖赏。1872年，他成为上议院议员。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举行毛奇纪念碑揭幕典礼。他担任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一直到1888年，当时，他已是高龄，为照顾他，还特设了总军需官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这期间，他主要致力于研究德国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问题，他从青年时起就坚持认为德国有一天将不可避免地同时对俄国和法国作战。

毛奇的最后几年是平静，勤奋和忙碌的，他完成了《论1870—1871年战争》的大型论文。1888年，他退役后还担任国家保卫委员会会长，他的军国主义热情并未因高龄而有所衰退，依然在议会里起劲地鼓吹战争不可避免，要求进一步扩军备战。

1891年4月24日，毛奇病逝于柏林。依照他军事地理学家一贯准确的算法，享年九十岁。他算不上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家，但却是最具现代意识的军事家，他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创建的总参谋部的现代指挥体系，至今仍为许多国家所沿用，他的东西两线作战，分进合击，速决战等战略战术思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具有明显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马汉

1805年12月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名叫奥斯特里茨的地方，爆发了一场有16万军队参加的战略会战。经过这一仗，拿破仑彻底粉碎了俄奥联军的进攻，法兰西帝国依然巍然屹立着。

90年后，在美国罗德岛海军学院的讲台上，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军战略讲师正侃侃而谈：

“拿破仑战争证明，大规模会战是决定陆上战争胜负的最有效手段。那么海战呢？同样需要这种倾其军力的会战，惟有如此，才能夺取制海权！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海上的奥斯特里茨’！”

马汉的声音不高，但却震动了世界。“海上的奥斯特里茨”成为穿着不同国家军服的海军元帅、海军上将领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又过了21年，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汉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不过，这壮观的会战不是发生在其理论的诞生地美国海域，而是在欧洲北海的一角，一个名声并不十分响亮的地点——日德兰。就是因为这场会战，使日德兰的名字永垂史册，也使马汉的理论开始广为人知。

起源于海洋文明的西方国家很早就重视海洋的意义，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几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力量都是以海权为基础的。

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年）是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他发现，人类在海上的机动性超过了陆地。他在研究了英帝国长期称霸世界的历史后，于1890年出版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海洋中心”说。马汉认为，商船队是海

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夏威夷群岛和巴拿马海峡，海军必须以“集中”为战略法则，同时要重视“海上交通线”、“中央位置”和“内线”；海军必须积极出击，不能消极防御。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在美国再版了30多次，并在全世界广泛流传。马汉也被后人公认为是海权论的鼻祖。他的突出贡献尤其在于对海权这一概念的创建和廓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体现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对当时的世界和后世历史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马汉是一个顺应时代而起又推动了时代发展的伟人。

马汉的有关海权的理论著作有20多部。马汉认为，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美国应与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英国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马汉明确表示，他的海权论是要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并公开称“强权即公理”。马汉曾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顾问，他的理论成了美国海军发展和海上扩张的理论根据。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案》，美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海军。19世纪最后10年，美国的海军实力由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英、法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完全控制了太平洋，把太平洋当作自己的“内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仍有700多个军事基地，4个作战舰队，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各型舰艇468艘。

鉴于马汉对美国海军战略的重要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直至今日，强大的海权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马汉的海权思想仍然深深影响着美国和世界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大国用于海军建设的开支占国防开支的比例很大，美国为30%，英国、日本23%，法国14%，意大利13%，德国12%。海军如此被重视，归根结底，不得不归功于马汉海权论的开山之功。

卡尔·克劳塞维茨

1831年11月16日，普鲁士王国的一位将军因患霍乱病离开了人世。可是他的名字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后人淡忘，他就是享誉世界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于1780年生于普鲁士一个税务官家庭。他从小酷爱军事，12岁参加普鲁士军队，13岁踏上与法国作战的战场，不久晋升为少尉。1801年，他被选入柏林陆军大学深造。在军校里，他刻苦攻读，勤于思考，获得了校长沙恩霍尔斯特将军的赏识。军校毕业后，他被推荐到奥古斯特亲王的部队担任副官。

当时，反法同盟各国的军队与拿破仑的军队正在征战。1806年，克劳塞维茨随亲王参加了著名的耶拿战役和奥尔施塔特战役，普军大败，他也在战败后被俘。翌年被释放回国后，他深感陈旧的军事制度无法适应近代战争，因而积极呼吁和参与了普鲁士军队的改革工作。1810年，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陆军大学的教官。在任教期间，他编写了《军事训练概论》等著作，并给普鲁士王太子讲授军事课程。1812年，因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与准备发动侵俄战争的拿破仑结成同盟，克劳塞维茨愤而辞去了教职，奔赴俄国参加了反抗拿破仑的战争。拿破仑被打败后，他重又回到了普鲁士军队，开始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1818年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这年他38岁；在任12年，致力于军事理论和战争史研究，著书立说。

法国大革命、历次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克劳塞维茨世界观、军事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但他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了这次革命在军事上引起的根本性变化，并对封

建主义军事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可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仍是资产阶级的中庸思想，在进步的观点中夹杂着反动思想、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以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指针，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首次对战争和军事学术等一系列现象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作了分析。克劳塞维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和征战，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许多军事历史著作。但其主要著作是《战争论》。

《战争论》的结论是：“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极高评价。

然而，作为唯心主义者的克劳塞维茨，把他国家的政治视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懂得政治本身的发展动力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对外政策的继续，而没有认识到战争同对内政策的联系，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政治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由于他没有揭示出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所以在他论述具体战争时，就无法阐明战争的侵略性或正义性。

克劳塞维茨认为“每个时代均应有其特定的战争”，军事学术的变化是由“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引起的。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学术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对军事学术中的“永恒的原则”，认为战争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他又否定在军事发展上存在规律性，并且断言“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在西方军事科学中明确提出了交战、战局乃至整个战争的一些实施原则：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于主突方向；发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坚决性；有效地利用既得战果。

克劳塞维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这也是他对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克劳塞维茨认为，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于克劳塞维茨没有弄清战争的社会本质和民众在战争进程中、战争结局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统帅的作用，因此他就无法认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克劳塞维茨死后出版的著作，构成了西方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完整阶段。他的战争学说是战争本质等问题的重要见解。《战争论》探索战争奥秘的深度是克劳塞维茨死后 100 多年来，任何一个军事理论家从未达到过的，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受到了各国的重视。曾经担任德军总参谋长、“施蒂芬计划”的策划人冯·施蒂芬伯爵在《战争论》第五版导言中写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有史以来有关战争的论述中最高超的见解”，“通过它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美国军事学说》的作者达尔·奥·史密斯将军写道：“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不是产生于美国，但是这种理论对美国的作战方法和政策都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在西方阵营还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克劳塞维茨的学说都受到高度的重视，并且拥有大量的拥护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也因此被视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

费迪南·福煦

费迪南·福煦，1914年率领法国军队在马恩河阻止了德国军队的进攻，随后在一战中拟订军事计划，率领协约国向同盟国发起决定性的攻击并取得了西部战线的胜利。尽管人们对福煦以沉重的军队伤亡做代价而取得战争胜利的攻击性作战方式褒贬不一，可这位法国将军却以他具有激发军队战斗士气和维护撤退部队的作战精神的非凡能力而闻名于世。

福煦军事生涯里亲历战争的时间很晚，直到升为将官才开始接触战争。1851年10月2日，福煦出生在塔布（Tarbes）的一个公务员家庭，1870年应募法国步兵团，但在普法战争中并未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1871年，他进入位于南锡的军事学院学习，1873年进炮兵团服役。

正当其他同时代的将军们在法国众殖民地战争中飞黄腾达载誉而归的时候，福煦却一直留在法国的军事学院里，从事军事理论和战术的研究和教学。1885年，福煦以军事史学讲师的身份进入法国陆军大学（Ecole de Guerre），1908年成为这所大学的校长。福煦非常崇拜和支持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及其理论，1903年他出版的《战争原理》（Principes de la Guerre）确立了自己研究战争艺术的道路。

福煦书籍所研究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着战略战术展开的，这些理论在他未来的战场指挥中证明是奏效的。他认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士兵和领导者“必胜的信念”。除了参战将士们的作战锐气之外，福煦还强调精密的战略部署与最大限度地利用火力和地形的重要性。按照他的作战理论来讲，防御只是重新发动进攻的准备。他奉行的信条就是“残暴或誓死的进攻”，这就着重强调了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或是伤亡人数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

价的进攻对战争胜利是很有必要性的。他还认为“进攻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位伟大的指挥官是有能力将这种理念灌输给他的士兵们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六十一岁的福煦担任法国第二十兵团总司令亲历了他的第一场战争。1914年8月8日，德国发动进攻试图夺取南锡。福煦重整初期受挫撤退的军队向德国发起了反攻。他用他的名言实践了他的军事指挥作战哲学：“我的左翼在投降，我的右翼在撤退，我的中路在崩溃，形势好极了，我将发动进攻。”

福煦的反攻尽管带来了大量的伤亡，可他却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挽救了南锡。1914年10月，福煦晋升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他率军阻止了德国沿马恩河向巴黎进军的攻势。这次的胜利使他担负起了协调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北部战场协约国军队的任务。尽管他没有直接派遣非法国军队的权力，但他却有权控制由法军组成的全部后备军。他苛刻的管制为他全盘控制协约国力量提供了某些手段和方法。

尽管福煦的领导在协约国军队中被证明是成功的，可他一直奉行的不惜大量人员伤亡的战略却惹怒了协约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们。1916年福煦领导的索姆河战役伤亡巨大，协约国军队损失总共超过了六十万，之后福煦就被调至次要的领导位置，担任了两年职位较低的军事顾问。

1918年3月，德国开始发起新一轮进攻，将协约国军队从战壕里赶回了法国，兵临巴黎。4月3日，福煦在英国军队和新参战的美国军队的支持下，担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他立即重组前线军队，并计划重新展开对德国的进攻。

福煦吸取了他在早期战争中展开严酷战斗和不惜大量伤亡的教训，此时制定了相应的进攻计划。1918年8月，晋升为陆军元帅的福煦改变了进攻德军主力的作战计划，转攻德国运输军需物品至前线的铁路线。他们将德国后勤运输路线切断后，德军兵败撤军，福煦下令展开猛烈的追击战。11月，协约国迫使德国军队宣布停战。

一战结束后，福煦荣任波兰与英国的陆军元帅。1929年3月20日，福煦逝世于巴黎，享年七十七岁，死后被安葬在巴黎荣军院拿破仑一世与亨利·德·拉·土尔·奥弗涅·德·杜伦尼的墓旁。

不论福煦军队造成的伤亡人数是多少，没有人去怀疑福煦对一战结果产生的影响力。他取得战争胜利的作战风格就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未来的指挥官们考虑到了福煦在一战中的经验教训，再没有人让军队投入到静态战壕战这样的浴血厮杀中去。然而福煦却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和将军，甚至那些反对他战术战略的人们也要承认他在战争初期挫败德国的进攻和最终将他们彻底打败的能力。

英国后来在伦敦郊外的维多利亚地铁站竖起了一座福煦的雕像，这里昔日是许多英国士兵倒下的前线战场。雕像的底座上篆刻着引用福煦的一句话：“我为英国而战，就是在为我自己的祖国而战。”

约翰·潘兴

约翰·潘兴（1860~1948年），美国著名军事家、五星上将。1882年进入西点军校学习，是一位出色的班长和学员大队长。1886年毕业后当过骑兵，在新墨西哥和南达科他边陲服役，参加了最后一次讨伐印第安人暴动（所谓“幽灵舞叛乱”）的战争。1891—1895年间，他在内布拉斯加大学任军事学教授。后来又回到西点军校任战术教官。1898年，参加了美西战争，英勇无畏地在古巴作战。战后，他被派往菲律宾服役，与棉兰老地区凶猛、尚武的摩洛人艰难地生活在一起，并成功地建立起美国人的统治。1916—1917年，潘兴亲率1.2万名美军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追捕弗朗西斯科·维拉，扼杀墨西哥兴起的革命运动。虽然追击徒劳无功，但对潘兴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如此庞大的部队进行实地作战。战争期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潘兴担任了美国欧洲远征军司令。由于对部属要求严格，这种严格有时甚至达到残酷的程度，因而得了个“凶恶的杰克”的绰号，1921年，他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24年退役。晚年任美国纪念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管理美国的纪念馆、纪念碑以及欧洲的基地。1948年7月15日，病死于华盛顿瓦尔特里德医院。

在潘兴的一生中，最值得他炫耀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所以，他专门写了一本回忆录——《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的确，一战时期是他军事生涯的顶峰，他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在此时得到充分的发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得尔·哈特在他《十年后的声望》一书中所说的：“可能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把美军建成如此规模的部队。没有这支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不

可能出现转机，更谈不上取胜。”可见，正是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才促使人们对他的军事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

1917年，潘兴携少量的参谋骨干，乘丘纳德班船“波罗的”号离开美利坚，赴欧洲走马上任。到达法国后，协约国军队狼狈的处境尽入眼底，于是他急切希望用美军来扭转战局。然而，此时正陆续运往欧洲的美军大多是素质较差的新兵，又缺少军官。英、法等协约国对这样一支军队嗤之以鼻，尤其对它的指挥能力不敢相信，因此，他们要求把美军编入英、法军队中去，并说这对美军利多弊少。协约国的要求使潘兴很恼火，他极力维持美军的“独立”状态，并明确指出：“凡是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愿为其他国家军队的建立提供兵员。”他坚持自己的立场，直至战争形势十分危急时，才形式上接受了协约国的要求，但依然不愿放弃美军的独立性和自己对美军的直接控制权。

潘兴之所以如此固执己见，原因是很多的，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协约国热心于堑壕战、阵地战，而潘兴则强调野战、运动战。潘兴认为野战是一种灵活性极大的战法，部队可以在地面上伺机运动，迂回攻击，“迫使敌人走出堑壕，并用运动战的形式将其消灭”，而协约国那种固守堑壕、不求强攻的打法是得不偿失的。事实证明潘兴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从1914年年底以来，交战双方拘于阵地、来回拉锯，未能向前推进几英里的距离，却付出了数百万将士的生命。潘兴明确认识到，“这样的账是付不起的”，要改变窘局，只有先改变作战方法。

同时，在野战中，步枪的作用也可以大大发挥，因为步枪在运动战中歼敌是有效的，是步兵的主要武器。相反，堑壕战是用炮兵开路，用手榴弹和炸药结束战斗，而步枪冷落一旁，甚至协约国军队战士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往往忘记朝敌人开枪，而把手榴弹扔出，结果与敌人同归于尽。潘兴极力强调步枪的作用，反对协约国的作战与训练方法，更反对协约国到他的军队中指指点点。

潘兴的态度使协约国很为不满。法国总理克里孟梭郑重地告诫道：“如果美国人不让法国人教他们，德国人会‘教他们的’。”

然而，潘兴却用实际行动“回敬”了协约国的“好意”。1918年5月底，美军在坎蒂格尼的战斗中顽强拼杀，获得大胜，与此同时，协约国军队却在节节败退。美军的得势使潘兴激动不已，他致电美国国防部说：“我坚信，我们的部队在欧洲首屈一指，我们的参谋人员不比任何军队逊色。”他甚至拍案怒斥：“谁胆敢再问我美国人会不会打仗，我就对他不客气！”潘兴的举动让人无可奈何，协约国军队大元帅福煦也只得急呼：“战斗！战斗！这是当务之急！”

在形势紧急的情况下，美军顶住了德军，他们牢牢地守在横跨巴黎公路的地带，挡住了德军的前进。据哈博德回忆：“中路的协约国军队没有一支部队能顶住德军的进攻。当德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时，能站稳脚跟的第一支协约国部队是美国的第二师。他们不但稳住了阵脚，而且还开始向前推进了。”6月6日，美军又向贝洛林苑的德军展开了一场攻势，他们英勇战斗，伤亡较重。6月25日，在一整天的炮火准备后，冲进了贝洛林苑。这次战斗使德国人再一次领教了美军的分量。此后，德军大多只有了招架之势。9月中旬，潘兴发起圣米耶尔战役，这是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独立实施的战役，尽管它本身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但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9月26日，美军又发动了马斯阿尔贡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整个战事也于11月份宣告结束。

潘兴是一位精细、勤勉又很有谋略思想的指挥员。他始终强调现代战争需要充足的准备，不能靠临阵磨枪。他决意打破依托深沟高垒的作战方法，冲破阵地的局限，主张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用兵。他的一个重要的谋略思想就是在运动中争取主动，消耗敌人，而不是蜷缩在阵地上，被动挨打。这个思想不仅在美国军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其他国家的军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鲁登道夫

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树立起来的一座所谓的军事丰碑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倾斜，那个一向被德意志民族殖民扩张分子们狂热崇拜的偶像——当时的德军最高统帅部第一军需总监鲁登道夫，面对兵败如山倒的黯淡局势，终于低下了他那颗曾是不可一世的头颅。自此，一战时期德国军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抛进了英吉利海峡。

鲁登道夫生于1865年4月9日，自幼受当过预备役军官的父亲影响，他希望自己长大后当一名威武的军官，去指挥千军万马。在这种思想驱使下，他十二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读书，后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890年，他又考入柏林军事学院深造。1908年至1913年，鲁登道夫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曾担任第二处处长，主管军队的训练、装备、动员等事宜。这时，整个欧洲大地战云密布，德国周边各帝国主义国家磨刀霍霍，加紧备战，眼看一场世界规模的残酷战争一触即发。面对这种紧张局势，鲁登道夫及时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加强陆军实力”和“配合军火工业，把宣传鼓动做为武器，用于最广泛的扩军备战之中去”的主张，使德国在一个时期内又迅速增加了30万军队。由于他扩军屯兵有功，因而他的军阶不断升迁，一度担任德军第三十九联队司令员等职务。

鲁登道夫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他的“大德意志民族”观念在早期就有所显现。也正是由于他身上害有这种痼疾，才使得他甘愿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效命沙场。他鼓吹、宣传实行大规模的“总体战略”，积极推行对外军事扩张和对内实行扩军备战政策，是德国“彻底消灭”理论的狂妄的支持者和叫嚣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军事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各帝国主义势力兵刃相向，粉墨登场。8月3日，德国军队为了实现长驱直入比利时，向法国腹地实施大纵深迂回，从背后狠狠打击法军主力的目的，在必经之路列日镇展开了一场恶战。战事刚起，德军自恃有新式大炮和优势兵力，原设想比利时守军会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孰料，他们面对的是列日花了二十年时间构筑起来的坚固工事，再加上比军将士英勇顽强，拼死抵抗，德军一次次冲锋都溃败下来。残酷的攻坚战斗连续进行了两天，德军伤亡惨重，尸体堆积如山，做为先头部队的第十四步兵旅指挥官“出师未捷身先死”，战局明显对德军不利。这时，鲁登道夫主动接替了第十四步兵旅的指挥职务。是夜，他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带领部队从比军防御阵地侧翼暴露出来的夹缝地带大胆实施穿插，像一把尖刀直刺守军心脏，尔后配合外围部队内外夹击，终于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列日之战”对实现德军最高统帅部速战计划意义重大，立下首功的鲁登道夫因此赢得殊荣，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奖。不久，任命他担任第二集团军军需总监的职务。

鲁登道夫在一战期间曾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普鲁士战役”。1914年8月中下旬，正当德军主力在西线向法国边境推进之际，俄国军队乘德国东线空虚，分兵两路向东普鲁士进犯。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德军仓促应战，连连失利。危急之时，鲁登道夫奉召奔赴东线出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同司令兴登堡联袂负责东线战事。最高统帅部在给他的电文中这样说：“你或许能挽救东线战事。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曾得到我们这样完全的信赖。德皇也完全信任你。”

到任以后，鲁登道夫果然不负厚望。他根据敌强己弱和俄军指挥不利等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制定了故意示弱，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兵器歼敌一部等作战方案，将俄军先遣部队装进预先设置的“口袋里”。经鏖战五昼夜，全歼俄国一个集团军，打死打伤和俘虏俄军共达十四万五千余人，从而扭转了东普鲁士的局势，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东普鲁士战役”被称颂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围歼战”。鲁登道

夫以此被狂热的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奉为不可战胜的偶像，顶礼膜拜，他的职位也于1914年11月擢升为东线方面军参谋长，再次与出任总司令的兴登堡合作。鲁登道夫虽然每次都以副手的身份出现，但他始终发挥着独立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他在《总体战》一书中说的“东线作战的领袖不是司令官，而是参谋长，作战意图取决于参谋长”。1916年8月，鲁登道夫靠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略，爬上了德国统帅部第一总监的位置，权力达到了势倾朝野的顶峰。这次，尽管他仍然和担任总长的兴登堡合作一起指挥全国部队，但实际上，军事上的指挥权多半落到了他的手里。1918年，德国经过几年战争的消耗，内外交困，财竭力衰，陷入了极度艰难的境地。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掀起了反战和革命的浪潮。面对现实，大权在握的鲁登道夫非但没有收敛军事扩张的野心，反而认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能使德国得到繁荣和发展。他扬言，为了胜利，就必须在军事上发动进攻，要进攻就必须进行大的决战。1918年，对于鲁登道夫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他不顾国内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倾军事上几乎全部实力破釜沉舟，先后炮制和发动了“米夏埃尔行动计划”和“埃纳攻势”，虽然在开始阶段进展顺利，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后来由于美国介入，德军终于在8月8日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鲁登道夫后来回忆说：“8月8日乃是世界大战史上德国最黑暗的日子”，“8月8日这一天确定了我们战斗力衰亡的命运，并把我在战略上为我们的处境寻找亡羊补牢之计的希望破灭了。”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下达了和平停战的命令，不久，他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只身逃到瑞典。

1919年春，鲁登道夫从瑞典回国。这时，德国经过所谓“自由与民主”选举，建立了魏玛共和国。1920年3月，鲁登道夫参加了以推翻共和国、建立君主体制为目的的卡普暴动。暴动破产后，他又贼心不死，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勾结，企图在德国建立起法西斯统治，结果又以失败而告终。1925年，鲁登道夫的军事论著代表作《总体战》出版，阐述了他“战争和政治都是以民族生存为目的，而战争则是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高体现，所以政

治是从属于战争的”这一战略思想。这一理论后来被希特勒继承下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37年12月20日，鲁登道夫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卡尔·冯·曼纳海姆

卡尔·曼纳海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了芬兰脱离俄国的独立运动，并且确保了他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都是独立的民族。他对有利地形和气候的明智综合利用使得他以战胜比他强大的武力。曼纳海姆被称为芬兰的乔治·华盛顿，是他的国家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

1867年6月4日，曼纳海姆出生在土尔库附近的洛乌希萨里（Villnas）一个贵族家庭，这时他的祖国芬兰还是俄国的一部分。1889年被任命为俄国轻骑兵的陆军中尉，曼纳海姆参加了1895年5月26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加冕礼的仪仗队。在1904-1905日俄战争期间，曼纳海姆学习了自己战争的主要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曼纳海姆中将指挥一个兵团抗击德国人。

随着1917年大革命中俄国军队的瓦解，曼纳海姆回到祖国加入了一场于1917年12月6日宣告芬兰独立的运动。1918年1月16日曼纳海姆在芬兰西部接受了反共产主义白军军事武装的指挥权，挥军向南驱赶赞成共产主义的红军。在瓦萨，曼纳海姆夺取了一个俄国的要塞和一批急需的武器弹药。有了这些战利品和装备，曼纳海姆继续对抗红军的行动直到3月16日在坦佩雷外遇到一支装备优良的军队。

曼纳海姆的进攻暂停了，但是稍后德国军队加入了战斗并于4月18日占领了赫尔辛基，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分割为两个部分。曼纳海姆利用德国人的胜利向东前进切断了源自俄国的卡累利地峡。随着俄国战败，德国人根据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被迫撤退，芬兰保住了其独立地位。曼纳海姆于1918年12月2日宣布为芬兰的摄政者，继续率军击败最后几支红军。随着

战争的结束和 1919 年 7 月 17 日芬兰共和国宣告成立，曼纳海姆隐退了。

1931 年六十多岁的曼纳海姆被芬兰政府召回，任命为国防部主席准备抵抗新兴的苏联的威胁。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曼纳海姆监督指导卡累利地峡（Karelian Isthmus）崎岖地带由相互联结的战略要塞组成的防御工程建设。

曼纳海姆防线变得知名是在其快完工时，苏联投入了将近一百万兵力于 1939 年 11 月 30 日对其进攻。曼纳海姆被任命为总司令率领只包含五万正规军总数不足三十万的士兵面对苏联的武装力量。虽然芬兰兵力弱很多，但是曼纳海姆把他的士兵训练得跟他的防御工程一样强大。每位芬兰士兵都有足够的冬衣，包括与雪景协调的白色外套，还有一副滑雪板以方便行动。

与之相反，苏联的军队训练素质低、装备贫乏。这些侵略者大多来自乌克兰，对在零下四十度的环境下如何生存都没有准备，更不用说战斗了。索姆斯萨尔米战役在 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1 月间进行，曼纳海姆利用天气和地形来拖延苏军的前进，设伏兵切断他们的补给线，然后用狙击兵和炮兵配合消灭被隔离开的部队。在侵略期间，苏联因被敌剿灭或被冻死损失了 2 万 7500 名士兵而芬兰只损失了 900 名士兵。俄国人还有两个完整的兵团放弃了武器和装备。

虽然芬兰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更多的俄军补充进来，无论曼纳海姆的士兵还是恶劣的天气都不再能压制住他们。2 月 1 日苏联聚集了五十四个兵团冲破了曼纳海姆防线。芬兰人作战勇猛，但是苏军强大的兵力还是在苏玛击败了他们的防守。1940 年 3 月 12 日芬兰投降，但是苏联允许这个国家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条件是他的人民不能组织游击战争反对占领者。芬兰总的伤亡人数是二万五千，估计苏联的伤亡是这个数据的十倍，还有四十万人负伤。

苏联和芬兰之间的和平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当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俄国时，芬兰与德国结盟，曼纳海姆再次担任军队指挥官，重振士气将俄国人赶出他们的国土。曼纳海姆的首次进

攻就成功地迫使俄国人撤退。虽然德国要求曼纳海姆向列宁格勒追击俄国人，但是他拒绝将他的部队带入苏联。在随后短暂的和平时期，芬兰政府将曼纳海姆提升为陆军元帅。

1944年，当苏联最终取得对抗德国的优势时，他们重振士气进攻芬兰。曼纳海姆的部队表现很好但是再次寡不敌众，芬兰再次被迫于1944年9月4日与苏联签订和平条约。作为条约的一部分，曼纳海姆指挥了他的最后一场战役将他从前的德国盟友赶出了他们占领的拉普兰。

根据新条约，曼纳海姆还接任了芬兰共和国总统一职。他专横的政治手腕堪与他出色的军事才能相媲美，曼纳海姆在战后保持芬兰的独立平衡了东西方的关系。他一直是政府首脑直到年纪渐大身体变差才被迫在1946年退休。他于1951年1月27日在瑞士的洛桑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没有曼纳海姆也许就没有芬兰。毫无疑问，他的军事和政治领导挽救了一个国家，否则这个国家不可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政治格局中生存。他对修筑大型防御工程的专业意见和他善于在崎岖地形和恶劣天气下利用运动战来抗击强大的部队为他赢得了最受尊敬的芬兰战士的声望。

他的表现也使他成为苏联最尊敬和惧怕的对手。在后来的四十年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曼纳海姆是可以阻止和打败自吹自擂、天下无敌的苏联军队的证据。曼纳海姆在本名单中相对较低的排名不是他个人领导能力和影响力的反映，而是因为芬兰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不大。

伦德施泰特

在纳粹德国的高级将领中，声望像伦德施泰特这样高的人为数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强，英国人认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最能干的指挥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资历深，其资历在纳粹将领中是首屈一指的，人们把他视为德国陆军的元老。旧日德国军人的典型。

1875年，伦德施泰特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据说，其家族的军人生涯已经延续850年之久。他的父亲出身贵族，青年时当过骑兵少尉，后来升到少将。1892年，17岁的伦德施泰特从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校毕业，被派到驻卡塞尔的步兵第83团任见习军官，一年后晋升为少尉，开始了正式的职业军官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大战期间，由于没有特殊的机遇和优异的表现，他提升得相当慢，大战开始时，他任预备第22师的上尉参谋，1916年晋升少校，任喀尔巴阡山某军首席参谋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以中校军阶加入共和国陆军，任骑兵第3师参谋长。1923年晋升上校，1926年任第二集团军参谋长，1927年晋升少将，1928年任骑兵第二师师长，一年后升为中将，1932年任第3师师长及柏林第3军区司令，半年后又任下辖六个师的柏林第1集团军司令，这时候他已经是上将了。

伦德施泰特是一个性格复杂、难以揣摩的人，他谦虚而又清高，缺乏自信而又多疑；有时沉默寡言，有时议论风生；有时感情冲动，有时又格外镇静和沉着。他的家庭生活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27岁结婚，只有一个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独生子。在军事思想上，他既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也不是一个守旧的人，比如在对待装甲兵的问题上，他虽不赞同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体制和战术，但又主张部队技术装备的更新，尤其是装甲部队的发

展。

伦德施泰特是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对政治缺乏兴趣，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常同他所在的陆军总部发生意见分歧。1938年元月，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突然被免职，伦德施泰特因此同希特勒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辩。

这年夏天，当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地区发生危机时，他指挥的第2集团军被内定为入侵捷克的主力。当慕尼黑会议解除了苏台德地区的危机后，厌倦官场生活的伦德施泰特主动呈请辞职。据德国一些人说，在这之前，他一再警告要避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8月下旬，德军入侵波兰的前夕，伦德施泰特被重新征召服役，希特勒任命他为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得力助手——德国陆军中的干才曼施泰因出任南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在入侵波兰的行动中，他们没有完全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计划执行，而是根据实际战况，毅然把第10集团军调到华沙北面阻止波军主力向东撤退，使波军大部遭到围歼。为表彰其卓越的指挥，希特勒授予他武士十字勋章，并任命他为东线总司令。10月18日，他又调任新职，任西线“A”集团军群总司令。

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对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英国远征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代号为“黄色方案”的作战行动的实施，是按曼施泰因提出的“镰割”计划进行的。伦德施泰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作为攻击主力，越过阿登山脉，直趋英吉利海峡沿岸，从马奇诺防线后进至瑞士边界，完成大包围态势。而“B”集团军群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开路，在航空兵协同下向阿登地区急进。“镰割”计划获得惊人的成功。英、法、比、荷、卢都溃不成军。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先后投降，英国远征军侥幸从敦刻尔克撤回本土，法国也被迫于6月22日投降。7月19日，伦德施泰特被希特勒提升为元帅。

1941年3月，希特勒在布雷斯劳召集会议，部署对苏联的入侵。伦德施泰特又被调到东线，出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他指挥的部队除德军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部

队。6月22日，德军发起全线进攻，苏军节节败退，伦德施泰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围歼了东面苏联元帅布琼尼部队的主力，于8月24日进至第聂伯河河口，突入苏联国土纵深达500多公里。8月到9月下旬，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又在其中中央集团军群的支援下，攻占了基辅，俘虏苏联红军60余万人。

11月，伦德施泰特又指挥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装甲集团军沿亚速海北岸继续东犯，一度曾攻占了罗斯托夫。伦德施泰特由于积劳过度，在其指挥部因心脏病突发而昏倒，后经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此时严冬来临，他意识到后勤补给线过长，缺乏冬季装备的德军难以在当地长期坚守，于是建议将部队后撤100公里，希特勒没有批准，于是他以心脏病为理由要求辞职。伦德施泰特以为希特勒会表示挽留并接受其意见。不料希特勒却立即答复道：“我批准你的请求，请你马上交出指挥权，伦德施泰特把指挥权交给了德国陆军元帅赖歇瑙，但防线并没有守住，不久就被苏军赶到了米亚斯河一线。

1942年3月15日，希特勒再次起用伦德施泰特，任命他为西线总司令。1942至1943年，西线无大战事，伦德施泰特主要是在其总部所在地巴黎，与德国的傀儡贝当保持接触。由于希特勒认为他对构筑沿海要塞工事态度消极，遂将此事交给了“B”集团军群总司令隆美尔。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伦德施泰特此时已看到德国在军事上是必败无疑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在强大的海空军支援下，出动大量地面部队在诺曼底登陆。盟国的空军夺取了从沿海到内陆纵深地区的制空权，切断了德军所有交通线，使德军在白天无法采取作战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伦德施泰特主张的“机动防御。已毫无意义。

7月2日，希特勒授予伦德施泰特一枚栎树叶骑士十字勋章，同时任命克卢格接替了他的职务。伦德施泰特回到德国休养，希特勒送他一张25万马克的支票，他把这笔钱如数存入银行，一直不曾动用。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事件败露后，伦德施泰特认为这是一种叛逆行为，他说：“作为一个军人，要受宣誓效忠

的约束。”正因为如此，他才奉希特勒之命担任了“德国荣誉军人法庭”的主席，负责审理反抗希特勒的案件。

希特勒为了利用伦德施泰特的影响鼓舞士气，于1944年9月1日请他三度出山，再次担任西线总司令之职。10月18日，伦德施泰特代表希特勒主持了隆美尔的国葬仪式，当然他并不知道隆美尔是被迫服毒自杀的。1944年12月16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所谓“伦德施泰特攻势”，但实际上伦德施泰特并不同意这次反攻，甚至根本不管，只是让他的部下们尽力而为之。他把自己的司令部仅仅作为了传达希特勒指示的通讯站。虽然德军在反攻初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后续力量不足等原因，在损失了大量兵力、兵器之后，至1945年1月底又被盟军赶回原出发阵地。1945年3月9日，在美军渡过莱茵河之后，他又一次被解除了西线总司令职务，奉命永久退休。

1945年5月1日，伦德施泰特在他的休养地巴特特尔茨被美军俘获，后来被引渡给英国人。他在英国度过了数年监狱生活，1949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获释。从那以后，他在一所养老院里度过余生，1953年3月24日死于心脏病。

约翰·富勒

通过发展装甲作战以及前瞻性理论，约翰·富勒为自己建立了20世纪首席军事理论家的地位。他的著作中包括有关战争的战术、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还包括军事历史，这些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时期的军事领导家们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1878年9月1日，富勒出生在英格兰南部的奇切斯特（Itchenor），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则是在德国受过教育的法国女人，1898年，富勒获准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短期驻扎爱尔兰之后，1899年率军乘船开往南非，领导英国步兵团和土著黑人土兵参加抵抗布尔人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富勒回到了英国。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和他的军队一直驻扎在印度，并往返于各个军事院校之间。富勒在这段时期中渐渐对战争原理产生了兴趣，他发展了有关战术突破胜于军事包围的理论，并阐述这一理论将成为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想法，富勒开始写作，在杂志和小册子上发表文章，并将他的想法应用在了军队集合、训练和军事部署等方面。富勒的这些著作以及他对充满神秘魔力事物的着迷，引起了批评家与反对者们的注意，使富勒的军事生涯变得荆棘密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富勒在法国军队里担任了许多不同的职务，得以证实了他突破就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的理论。然而，在充满机枪扫射、带刺铁丝网以及重炮轰击的堑壕战中，还没有一种现有的武器能够成功地突破敌军前线。1916年，富勒首次在战争中使用坦克，并认识到最终只有坦克才是可以成功突破的武器。

1916年12月，英国建立了坦克军团，富勒稳坐军团参谋部总参谋长之位，并升任为陆军中校。随后开展了他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袭击战。

1917年11月20日，富勒率领坦克军团突破德国战线，取得了康布雷（Cambrai）战役大捷。这次战役标志着装甲战争时代的到来，并使坦克在战场上成为武器中的重中之重。

之后富勒继续担任坦克作战的总设计师，并制订了“1919年计划”作为结束战争的最后总攻。他在“1919年计划”中提议使用超过四千辆具备远程作战能力的新型坦克发起进攻，突破敌军战线之后，另外的一千辆坦克穿过打开的缺口，向德国领土纵深进攻，瘫痪其指挥体系，空中则利用飞机进行轰炸扫射后勤基地和德国增援部队来配合地面进攻。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使得富勒没有来得及实施“1919年计划”，可却为下一次世界大战中支配早期战局的“闪电战”（深入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大战结束后，富勒回到英国，并成功地建立起皇家坦克军团。此时，除了战前的反对者之外，富勒的敌人中又加入了英国骑兵团，他们反对把战马换成金属机械。富勒是一个从来不会忍受愚蠢的人，也永远不会放弃争辩，他回应那些反对者道：“没有什么再比科学更神奇的了。我们这些为战争服务的人必须抓住这个魔棒，以迫使未来听我们指挥。”

在参谋部供职的同时，富勒写出了许多的军事理论著作。《大战中的坦克》（TanksintheGreatWar，1920）与《战争改革》（TheReformationofWar，1923）两本书中包含了他的许多提倡进行装甲战的提议，这与当时的军事思想与作战实践有些矛盾，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领导人们都认为富勒作品中的理论有些极端和不切实际。1926年，富勒担任参谋学院院长，并出版了他名为《战争的科学基础》（TheFoundationsoftheScienceofWar）的演讲集。在这段时期里，富勒还成为同是军事理论家的巴西尔·李德尔·哈特（BasilLiddellHart）的良师益友，他们除了有一些政治观点上的小分歧外，余下在生活里一直都是—对伙伴。

1926年，富勒在皇家总参谋部任职，继续他军事理论的创作。他坚持提倡突破战理论，并对上级和同盟军强调并依靠毫无攻击力的保守战而感到愤怒。他还中肯地表明了“马其诺防线”将会成为“法国军队的墓碑”，1927年和1930年，富勒两次谢绝了指挥作战的委任，并于1933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他现役出版的结论性书籍《野战条令Ⅲ》（FieldRegulations III，1932）进一步阐述了他一直未曾改变的观点，那就是坦克战将会构成未来的战争世界，这个结论在大不列颠岛以外极容易地就被人们接受了，就连德国与苏联军队的总参谋部也在采用并研究着这个结论。

退役之后，富勒曾进入政界一小段时间，还被选为法西斯派议会候选人，他这个时期的著作中包含了些许模糊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同时他还作为《每日邮报》（DailyMail 伦敦）的随军记者报道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与西班牙内战。在英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富勒提出转服现役，然而即使战争中的盟军与敌军都在研究并执行着他的理论，可他再没被召回英国军队。

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里，富勒转向军史，他的《武器与历史》（ArmamentandHistory，1946）一书是一部研究武器发展与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辉煌著述，而他出版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三卷本）》（MilitaryHistoryoftheWesternWorld，1954~1956）则阐述了从远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发展史。1966年2月10日，富勒在英国的法耳默斯（Falmouth）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富勒截止到临终前已经出版了共四十多部作品，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

富勒有一个“多骨”的绰号，不只因为他身材瘦弱，还有他盛气凌人的个性。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战术战略思想家，他的理论，尤其是机动的装甲作战理论影响了当时欧洲大部分的军事领导者。他是一位不寻常的军人，极其聪明且坦率直言；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创造性思想家，留下的作品中包括李德尔·哈特为他保存的作品，至今都非常具有影响力。虽然富勒强调突破战的

重要性和开发装甲部队潜在能力的思想至今都极具价值，可相比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安东万·亨利·约米尼、孙子这些军事理论家的理论来说，富勒的战争艺术不如他们的更具普遍意义。

伏罗希洛夫

克列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的故事》的前言中写道：“我不信上帝，但我感激自己的命运。因为降临我头上的那条道路，正是我有幸走过来的道路。再也没有比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事业更崇高的了。”因此，苏联人称他是“军队的统帅”和“人民的儿子”。

伏罗希洛夫在其一生的军事活动中，曾荣获 8 枚列宁勋章，6 枚红旗勋章，以及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和许多苏联奖章。1935 年 11 月 20 日，苏联首次授予五名苏军将领元帅军衔。伏罗希洛夫是这五名元帅之一。1920 年，他获得革命荣誉武器——带镀金刀柄的、刻有红旗勋章的军刀，1968 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

1881 年 2 月 4 日（公历 1 月 23 日），伏罗希洛夫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里。父亲叶费列姆·安德列耶维奇，当过兵、打过仗，后来做铁路巡道工，母亲玛丽姬·瓦西里耶夫娜是个农家女子，比丈夫小 13 岁，常以打短工的繁重劳动来补贴贫寒的家庭生活。

伏罗希洛夫童年时期生活贫困。直到 13 岁，他才进入一所乡村学校读了两年冬季补习班。1895 年从这所学校毕业后，他还渴望继续读书，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梦想。

1896 年，他进入尤里耶夫卡冶金公司的一家工厂，当上了钳工学徒。1903 年到卢甘斯克的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做工。在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是与列宁分不开的，从此，伏罗希洛夫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列宁领导的党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1905 年 1 月 9 日，彼得堡 14 万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及其

家属举行示威，遭到沙皇军队镇压，死伤工人 3000 多名。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开端。卢甘斯克地区的工人和农民都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2 月 16 日，伏罗希洛夫参与领导了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工人罢工，并发表了演讲。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

此后，伏罗希洛夫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曾多次被捕，遭到监禁和流放。在霍尔莫戈雷被监禁的时候，他结识了女政治流放犯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戈尔勃曼。两人彼此相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伏罗希洛夫正在察里津（后改为斯大林格勒，现为伏尔加格勒）的一座大炮工厂做工。他在工人中进行反战宣传。在 1917 年二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来到彼得格勒。发动了伊兹麦洛夫禁卫团起义。起义进行得极为顺利，最后士兵们选举伏罗希洛夫为彼得堡工人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前夜，他按照列宁的指示，加强了矿区工人的工作，在工人中建立了赤卫队。积极参加十月革命。11 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人民委员。

1918 年 3 月 6 日，基辅陷落于德奥军队之手，哈尔科夫和彼得格勒都处于危险之中。伏罗希洛夫组织和领导了第一支卢干斯克社会主义游击队，开始对德奥军队作战。伏罗希洛夫自己把这件事看作是军事工作的开端。3 月下旬，他率领游击队从卢干斯克出发，向科诺托普前进。在科诺托普，游击队与德奥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率领的游击队在哈尔科夫工人游击队的配合下，击退了德国第 27 预备兵团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力量悬殊，哈尔科夫于 4 月 8 日被德军占领。

不久，卢甘斯克也面临着被德奥军包围的形势。他率领部队掩护 80 列火车由顿河草原向察里津撤退。此时，他已被任命为第 5 集团军司令，指挥两个军和由莫罗佐夫军区与顿涅茨克军区居民组编的部队。在这里，他指挥的部队不仅对入侵乌克兰的德奥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而且与顿河哥萨克白匪军苦战了三个月，到达察里津与苏军主力会合。

1918年的察里津保卫战，成为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最重要战役之一。伏罗希洛夫率部从顿巴斯突破封锁来到察里津之后，大大加强了察里津市的防御力量。7月19日，伏罗希洛夫到刚建立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任副主席，同时担任了察里津前线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为了有充足的兵员，他派人到农村动员可靠分子参军，并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他把零散的游击部队编成正规兵团；为了对付机动性强的哥萨克骑兵，他组建了几个用大量机枪和火炮装备的加强师；为了支持步兵和骑兵作战，他组建了装甲纵队。所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察里津的防卫。苏军在伏罗希洛夫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显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1918年11月，他当选为乌克兰工农政府委员、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19年5月，他领导了格里戈里耶夫的剿匪作战。6月，出任第14集团军司令。不久，指挥了卡捷林诺斯拉保卫战。后任乌克兰内线司令，指挥了基辅保卫战。

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一样认为，大批骑兵部队机动灵活而且威力巨大，苏联红军必须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集团军。于是，当布琼尼向中央提出这一建议时，他表示完全赞同。1919年11月，伏罗希洛夫便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军的军事委员。布琼尼在回忆中说道，伏罗希洛夫“是领导全军作战的核心人物之一”。“骑兵部队的特殊组成要求任命不仅具有一般政治声望，而且要多多少以自己的军事生涯闻名于众，享有一定威信的人。”伏罗希洛夫率领这支部队粉碎了邓尼金军队的进攻。从波兰白军手中解放了乌克兰，消灭了弗兰格尔的部队。

此后，伏罗希洛夫在苏联红军中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党务工作。从1924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与伏龙芝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军事改革。1925年至1934年，他升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又担任了6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为加强苏军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

卫国战争一开始，他就直接参加了粉碎德军进攻的组织工

作，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和列宁格勒前线司令、游击队总司令等职。但由于他对战争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仍停留在骑兵时代，对当代战争中的新情况认识不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一般，未能像在国内外战争中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1945—1947年出任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1952—1960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因被指责为支持反党集团而未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大后，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12月2日病逝。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帕夏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帕夏于1881年5月29日出生在奥斯曼帝国内萨洛尼卡城（今属希腊）。他的父亲阿里·李查当过海关职员，又做过木材商和盐商。凯末尔7岁那年丧父，一直跟随他的祖母一起生活。12岁的凯末尔进入萨洛尼卡幼年军事学校，14岁升入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因为他和这里的一个老师穆斯塔法同名，老师为了便于区别，在他名字的后面加上“凯末尔”（Kemal 意为“完美”，“完善”）。毕业之后，凯末尔到首都进入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1902年毕业后又继续在参谋学院学习，1905年毕业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从此带兵作战，并晋升到校官直至将军、元帅。

凯末尔为了土耳其的新生奋斗了一生。在他生活的时期，土耳其正处于内忧外患时期，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法国和英国掌握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德国则控制了帝国的政治和军事。德国里曼将军率领的70名德国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操纵着土耳其的政府和军队，并于1914年8月迫使土耳其签订《德土军事同盟条约》，把土耳其拖入对协约国的战争，最后土耳其战败。

土耳其战败，标志着50年庞大帝国的崩溃。根据签订的战败和约：土耳其军队立即复员；交出全部军舰；由协约国军队占领黑海海峡各处要塞等等。随后，协约国军队先后进占了土耳其几乎全部的国土。1919年底，占领军达10万多人，其中英、法军队均在4万以上。1920年8月，英、法、日、意、希腊等国同土耳其苏丹政府在巴黎附近的色佛尔签订和约，共433条，基本精神就是肢解和灭亡土耳其，不仅把土耳其原有属地削减了3/4，而且对本土进行瓜分，仅剩下的安那托利亚高原地区（即小亚细

亚半岛)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主权。条约把土耳其推向了亡国的边缘。这时凯末尔承担了拯救土耳其的重担。

在凯末尔的学生时代,由于欧洲列强的入侵,苏丹政府的腐败,民族受压迫,同胞被奴役,这一切凯末尔都看在眼里,他无法忍受,所以他便积极串连校友,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民主思想。在毕业之后,他被捕入狱,后因没有任何证据,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之后把他释放了。出来以后,因在监狱中看到了苏丹反动统治的腐朽,他就在大马士革和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医生、知识分子组成了“祖国与自由社”。后来这一组织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合并,凯末尔本人也积极地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组织的革命,并且在反对封建势力进攻的军事斗争中表现出色。但因凯末尔不同意青年土耳其党人保留帝制主张,所以他受到了排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拒不听从凯末尔的正确建议,跟随德国参加了反对协约国的作战。凯末尔在国家的危险之际,毅然担负起了保卫祖国的重担。在这场战争中他成了名将。凯末尔在1915年担任了人数少、装备差的新编19师的师长,他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击溃了英国军队从海上和陆上的进攻,打碎了英国通往俄国的企图,保住了伊斯坦布尔的安全。这场战争使凯末尔名声大振,为此他获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并且被晋升为军长。

一战之后,按照停战协议,土耳其要交出他的军队。而在叙利亚前线的凯末尔,拒绝交出军队。但是从伊斯坦布尔传来了不许抵抗的命令。凯末尔愤然辞职,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向苏丹表示,只要成立由凯末尔自己担任军事大臣的强硬政府,就能够把侵略军赶出土耳其,并拯救土耳其。但是,苏丹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对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组成的政府完全失望了,他决定前往爱国力量集中和民族运动高涨的安那托利亚。

安那托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土耳其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地方,这里新兴了许多的中小型企业,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战败后签订的和约使他们失去既得利益,

所以安那托利亚成为土耳其民主主义的发源地，民主主义蓬勃发展。

凯末尔在萨姆拉就任第九军团检阅使。安那托利亚的人民给了凯末尔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1919年，在锡瓦斯召开安那托利亚和罗姆里护权协会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凯末尔当选为领导机构代表委员会的主席。大会坚决要求外国占领军撤退和恢复土耳其民族主权。有土耳其独立宣言之称的《国民公约》也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形成。他还成立了土耳其国民革命军，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准备了力量。凯末尔在大会上大声疾呼，要土耳其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并提出了“不独立，毋宁死”的口号。从此，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之下为民族的独立展开了艰苦的奋斗。

1920年开始，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向土耳其进军，进入到安那托利亚的腹地。凯末尔利用这一时机，开始组建土耳其国民军。他号召复员的军人起来为祖国的生存而战，以复员军人建立国民军的骨干，凯末尔还注意和农民武装建立联系。在凯末尔为民族独立的强大号召力之下，许多官兵脱离旧政权参加国民军，各地的农民游击队和自卫军也先后加入了国民军。

1921年初，15000人的国民军，在伊诺努战役中，面对四倍于自己的敌军顽强斗争，打败了希腊入侵军。到8月份，凯末尔亲自指挥5万国民军，同10万希腊军在距安卡拉40公里的萨卡里亚河岸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凯末尔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动员全体军人不惜一切牺牲，英勇抗敌。所有男子都上了前线，运输弹药的任务就几乎全交给了妇女。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将一发发炮弹送入战壕。成千上万土耳其儿女的血汗洒遍了萨里卡亚河畔。凯末尔后来回忆这次战争时说：“阵地的防线是没有的，有的是肉体的防线。这肉体的防线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人民的每一寸领土，都是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在凯末尔亲自指挥下，经过22昼夜的血战，击溃了进犯的希腊军，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凯末尔因这次胜利被大国民议会授予“加齐”（胜利者）的称号，并晋升为土耳其国家元帅。

1924年8月26日，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土耳其国民军开始反攻。两周之内把英国支持的希腊军全部赶出了安那托利亚，收复了伊兹密尔，俘虏了希腊军的总司令库皮奇将军，迫使苏丹逃亡国外。1923年，英、法、意、希等协约国成员同土耳其在瑞士洛桑签定了《洛桑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确认了土耳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1923年10月，土耳其国民军进军伊斯坦布尔，实现了全国统一，并且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通过宪法，定都安卡拉，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1924年3月3日，神职哈里发被废除。1928年4月10日，宪法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土耳其至此完全成为世俗的共和国。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他努力使土耳其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使土耳其世俗化，反对伊斯兰教神权势力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控制和束缚等等，这一切后来被人民称为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说来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专制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获得了新生，并且致力于建设富强的新土耳其。

乔治·马歇尔

1880年12月31日，乔治·马歇尔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万尼敦镇的一个商人家庭。1897年9月，17岁的马歇尔进入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校学习期间，由于他为人笃诚，才干突出，一年级就当学员分队长，两年后被任命为全院学员队长、全院学员大型集会指挥。除了弗吉尼亚军校，马歇尔还上过利文沃思堡步骑兵学校、陆军参谋学校，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01年9月，马歇尔参加军官委任考试，次年2月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少尉。2个月后，他被派往菲律宾，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供职。马歇尔第二次带兵执行任务时，就遇到了士兵们粗野无礼的捉弄。当他们趟过鳄鱼出没的一条小河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鳄鱼！”士兵们争先恐后把马歇尔挤倒在泥水里。马歇尔借此机会严肃军纪；他把士兵们集合起来，在这条河上来回趟了两次。他的严格、镇静，使士兵们肃然起敬。

1917年6月，马歇尔随陆军第1师到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他被晋升为临时中校，并担任师代理参谋长。有一天，美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来1师观摩军事演习，马歇尔设计的一套运用新方法猛攻敌人战壕的演习，引起潘兴的注意。不久他又被提升为临时上校，并被调到驻肖蒙的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工作。在那里，他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战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歇尔调任第8军参谋长。1919年9月马歇尔回国，他的临时上校军衔被取消。直到1936年8月，56岁的马歇尔才晋升为准将。

1938年夏，马歇尔被任命为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处长，接着又改任陆军副参谋长。这一年，慕尼黑协定签订，战争的阴影在美

国上空徘徊。但作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其军事力量竟排在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在内的 16 个国家之后。对此，马歇尔认为必须立刻采取措施，重整军备。1939 年 9 月 1 日，马歇尔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同时晋升为四星上将。他站在全球的战略高度，分析了美国卷入世界战争的必然性。他的精辟见解，驳斥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和不干涉主义者反对美国介入战争的论调。他还直率地向总统进言，给总统分析国际局势、美国军事现状以及它所面临的威胁。总统心悦诚服，两天后便把这项计划提交国会批准，为美国的军事发展开了绿灯。至此，美国的军队建设和军备发展迅速展开。一支不到 20 万人马的陆军部队发展到 537 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作为参谋长，马歇尔十分重视优秀军官的挖掘和提拔工作，他查阅了手下高级军官的档案，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需立即退役的将官名单，并建议提拔一批年轻的、具有现代战争思维的人才。艾森豪威尔当时是个年轻的上校，是马歇尔建议予以提升的人选之一。巴顿能领导部队赴汤蹈火，马歇尔建议一有装甲部队就交给巴顿指挥。更难能可贵的是，马歇尔在用人上敢于承担责任。魏特迈是个有才干、有学识的人才，他曾在德国军事学院读过二年半书，他参加拟定的一项有关与德国作战的计划被泄露了，于是他成了头号嫌疑犯。但马歇尔对他信任不疑，指示陆军部长不能撤换他。正是在马歇尔的努力之下，美国陆军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转机，盟军决心在 1944 年渡过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那么谁来执掌帅印呢？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马歇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同盟国首脑们一致同意由马歇尔担任此职。但罗斯福总统认为，一旦马歇尔出任欧洲最高司令，无人能接替他担当美国在全球性军事行动的指挥。马歇尔体谅总统之心，自觉放弃了这次千古扬名的机会，而把它转让给了艾森豪威尔。

1945 年 8 月 20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一个星期，马歇尔致信杜鲁门总统，请求辞职，退隐还乡。同年 12 月作为总

统特使赴华调解国共关系，参与国共谈判。

1947年1月，他被任命为国务卿，掌管美国外交事务，他拥护推行“冷战”政策的杜鲁门主义。在此期间制定和推行了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1959年10月16日，马歇尔病逝于沃尔特里德医院。终年79岁。

古德里安

古德里安 1888 年 6 月 17 日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陆军军官。古德里安 13 岁进入军官学校，1907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轻步兵营任见习官，而这个营的营长就是他的父亲。1913 年 10 月，他与在汉罗福省驻防时相识的玛加丽特哥尔尼小姐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骑兵部队担任指挥官和参谋。

1922 年，他调到陆军运输处，开始确立机械化观念。青年时代的古德里安，就具有创造性的想像力，从不满足于现有的战术、技术和兵器。他经常在《军事周刊》杂志上发表探讨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以至这个周刊的主编阿托克将军经常访问这位年青的军官。他常常利用战术演习和兵棋推演的机会，发表自己关于战车将成为地面战场主宰的新观念。于是，古德里安逐渐有了名气。1931 年，他出任摩托化部队总监部的参谋长。1934 年 7 月，德国组建了装甲部队，希特勒派古德里安为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系统地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英国人利德尔·哈特和富勒的军事理论，逐渐萌生了以机械化部队为主体，各军兵种密切协同的战术思想，希特勒信奉的机动、攻击、迅速的“闪击战”理论，也为古德里安欣然接受。

装甲兵总监这个职务，使古德里安得到了把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1930 年，德国的摩托化部队只有几辆陈旧的装甲侦察车和几个摩托车连。到 1932 年，参加演习的摩托化分队还在使用模型坦克。古德里安担任装甲兵总监后，德国装甲兵得到了迅速发展。希特勒非常欣赏古德里安坦克战的理论和实践，他不仅在财力物力上优先满足装甲兵发展的需要，而且每当演习和试验新坦克时，他都亲临现场。当他第一次参观古德里安

组织的坦克群进攻演习时，面对排山倒海的钢铁洪流，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1935年3月，希特勒彻底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德国陆军当年就把一个装甲旅扩编为三个装甲师，每个师有561辆战车。古德里安是其中的师长之一。

古德里安的过人之处是他的战术远见。他设计的作战形式就是坦克集群的高速进攻。1936年至1937年，他写了一本名叫《注意——装甲兵》的书，书中阐明了他以后在战争中运用的坦克战术。1938年，希特勒任命古德里安为机动部队总监，统管装甲部队的一切组织和训练事项。这一年，德国又试制成功了两种新型坦克，这两种坦克在策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基本装备。同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古德里安率两个装甲师打头阵。尽管路上有些战车因技术故障而抛锚，但还是在两天之内前进了数百公里，创造了部队机动速度的新记录。从而显示了装甲部队的优越性。

1939年，古德里安任第19军军长。这个军包括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在闪击波兰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出色地执行了希特勒速战速决的战术原则，也使自己提倡的“闪击战”理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古德里安把他所在的“北方”集团军群中的两个装甲师和两个轻装甲师集中起来使用，横冲直撞，锐不可当，强渡了那累夫河。9月14日，突破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筑垒地域，17日与“南方”集团军群的前卫装甲部队在布格河畔的符沃达瓦会师。古德里安像隆美尔一样，从来不在后方指挥，他总是乘坐装甲指挥车与先头部队一同前进，靠无线电同他的指挥机关和各师师长保持联系。有时由于前进速度过快，甚至进入已方的炮击区而险遭厄运。

波兰投降后，古德里安又转战西线。他所在的19军属伦德施泰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1940年5月，该军作为在色当地区的攻击主力，从法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5月13日就渡过马斯河。一天之后，古德里安坦克军在色当以西和以南扩大了桥头阵地，并击退了法军第三装甲师的多次反击。当时在他看来，只有两件事可以阻止装甲部队的前进，即汽油耗尽和到达英吉利海

峡。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对装甲部队高速进攻获得的巨大战果感到惊疑，为防止法军发动翼侧反击，急令各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对前线情况了如指掌的古德里安及一些前线指挥官们认为，这无异于放弃奇袭，会丧失一切初步战果。于是他们据理力争，终于获准作进一步的“强力侦察”，“扩大桥头阵地”。古德里安对这项命令加以灵活解释，率领部队沿索姆河一线神速前进。5月18日到达圣康坦，19日强渡索姆河，20日其前卫抵达阿布维尔和英吉利海峡，接着又由阿布维尔向北推进，22日占领布伦。6月初，古德里安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率领所部又取得了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古德里安和他的坦克兵拖着德国陆军前进，创造了现代史上空前的胜利。

1941年6月28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兵团属中央集团军群，担负了向莫斯科方向突击的任务。战争初期，他们节节获胜，10月份，曾攻到距莫斯科几十公里的地方。但到12月初，由于冬季的来临、苏军的英勇抵抗和德军战略目标分散等各种原因，进攻莫斯科之战以失败告终。12月6日，古德里安被撤职，编入预备役，过了一年多闲散生活。1943年2月，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之后；又重新起用古德里安，任命他为坦克兵总监，让其负责装甲部队的发展、组织和训练。在他任职期间，德国著名的虎式和豹式坦克投入生产并装备部队。

1944年7月，谋杀希特勒的事件败露后，与此事无关的古德里安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但这时德军的失败已成定局，第三帝国大厦将倾，已是独木难支。1945年3月底，希特勒免去了古德里安总参谋长的职务，再次将其贬入预备役。5月10日，古德里安被美军俘虏。不久获释。

1954年，古德里安病逝。这位坦克战专家虽然到底没有挤进元帅的行列，但他为法西斯德国称雄一时所起的作用以及所负盛名，并不亚于纳粹德国26位元帅中的任何人。他的肖像至今仍挂在德国的装甲兵军营中。

切斯特·尼米兹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海军统帅，切斯特·尼米兹策划、协调和执行了在太平洋战场打败日本天皇海军的行动。尼米兹在与美国陆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合作上，展现了自己的交际能力，而在利用有限的资源取得出人意料胜利方面，则显示出他的战略战术技巧。尼米兹在航空母舰和水上舰队的军事行动和之前在潜水艇舰队服役的经历使他能率领混成的太平洋海军取得完美的胜利。

1885年2月24日，尼米兹出生在离大海很远的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Fredericksburg），最初希望进入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但是在得知西点军校没有剩余的名额时就接受了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录取。毕业后，尼米兹加入了美国亚洲舰队，加官晋爵为驱逐舰迪卡特号（Decatur）的舰长。1908年7月7日，他让迪卡特号搁浅几乎终止了他的军事生涯。尽管他因渎职被送军事法庭，但是他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谴责。

回到美国后，尼米兹被分配到几个潜水艇上任职，一直到1913年去欧洲学习德国和比利时柴油机的技术发展。在他回到祖国后，他运用这些情报监督指导柴油机推动的美国军舰莫米号（USS Maumee）并且1916年起航后留在军舰上担任执行船长和总工程师。

1917年4月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尼米兹和莫米号加入了大西洋舰队。8月，在被提升为少校后，尼米兹成为潜水艇部队指挥官辅助决策塞缪尔·S·罗宾逊的助手。这位海军上将与他的导师的友谊很好地保持到了下一个十年。

战后，尼米兹在华盛顿的海军参谋部任职，1920年转到了珍珠港视察新的潜水艇基地的建设情况。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

在各式潜水艇和战舰、驱逐舰上服役。他还几次返回华盛顿协助在美国大学里成立第一批海军预备军官训练团计划。

1938 年被提升为海军少将，尼米兹在圣地亚哥担任一支巡洋舰团的指挥，在夏威夷担任一支包括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在内的战舰团的指挥，随后在 1939 年回到华盛顿担任航海局的局长。1941 年当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时，尼米兹主管海军人事，负责在这场大战中组织人力资源。

1941 年 12 月 31 日，在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推荐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尼米兹为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并将他提升为海军四星上将。尽管在太平洋战区由一个美国指挥官统一指挥比较有利，但是无论是陆军还是麦克阿瑟将军都不愿在一个海军军官手下做事。结果，两个指挥官共同主事，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一起负责指挥太平洋战区，幸运的事，首先是因为尼米兹的交际能力，两个指挥官相处得很好，他们都认为有太多的日本人需要他们对付而无暇相互争斗。

尽管盟军认为对付日本人的战场次要于“欧洲第一”计划，尼米兹并没有推迟阻止日本扩张，收复他们的失地，将战火推向日军本土的策略。利用美军密码破译人员提供的日军的作战计划，尼米兹于 1942 年在珊瑚海歼灭战中第一次打破僵局。

6 月，再次利用数据情报，尼米兹确定了由袭击过珍珠港的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率领的敌军的位置，在中途岛附近海域。在日本的飞机还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补充燃料和更换弹药时，尼米兹赢得了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海军的第一次胜利，这也是日本海军在 350 年来的第一次战败。在这场战役中日本损失了整个舰队中 9 支航空母舰中的 4 支，超过 300 架的飞机和很多日本最优秀的飞行员。

在关键的中途岛战役中，战争的主动权转到了美国人手中，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在一系列的越岛作战战场中成功合作，越来越逼近日本本土。尼米兹在 1943 年 11 月占领了吉尔伯特岛，1944 年 2 月占领了马歇尔岛，1944 年 8 月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10 月，他加入了麦克阿瑟的队伍收复菲律宾群岛。美国的领导阶层

公认尼米兹的成就，将他提升为新设立的海军五星上将。

1945年初，尼米兹指挥对关岛、艾渥吉马和冲绳的进攻。当日本在经受两粒原子弹轰炸后投降之时，尼米兹正在准备入侵日本。1945年8月29日，尼米兹乘坐美国军舰南达科塔号旗舰开进东京湾。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上，尼米兹作为美国的代表在条约上签了名。

10月5号，海军上将回到华盛顿受到热烈欢迎，这一天被誉为“尼米兹之日”。在欢庆后不久，尼米兹接任了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管理士兵和军舰的复员，同时为核潜艇的发展提供资金。他在1947年12月15日退休。第二年，他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的海军部长顾问，随后做了两年联合国驻克什米尔专员。尼米兹在1966年2月20日他八十一岁生日的前几天死于一场手术后的并发症，安葬在旧金山的金门国家公墓。

尼米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海军领导人，他善于鼓舞士兵的士气并与各方合作。他丰富多彩的经历使得他能执行大胆的行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在一场最具深远意义的战役中，尼米兹在中途岛打败了日本最优秀的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

乔治·巴顿

在人类的战争历史中，时常涌现出一些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的天才人物。他们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斗志和勇气，又不乏浑然天成的指挥才能，所以能在广阔的疆场上建立不朽的功勋。美国陆军上将乔治·史密斯·巴顿就是这样一位光彩夺目的璀璨将星。

1940年6月的一天，一列火车徐徐驶入美国西点镇的火车站，著名的西点军校就在这里。在下车的新学员中，有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碧眼金发、神色坚毅的青年，他就是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威名赫赫的乔治·巴顿。

1885年11月，巴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曾祖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准将，祖父和父亲都毕业于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巴顿19岁进入西点军校。一年级时，因数学不好，留了一次级，但他对橄榄球、田径、剑术等都很擅长，特别是剑术方面颇有造诣。巴顿雄心勃勃，相信自己是命中注定的伟大人物，他奋发努力，从不懈怠。他曾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只要今天我能伟大，则明天受苦而死我也甘心。”

巴顿从步入军界起，就把杰克逊的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基本格言：“不让恐惧左右自己”。他认为这是军人能够勇猛无畏的根本因素。巴顿发现自己虽然勇敢，但在危险面前并非毫无顾虑。于是他决心要进行锻炼，克服恐惧心理。骑术练习和比赛，他总是挑最难越过的障碍和最高的跨栏；在西点军校的最后一学年里，有几次狙击训练，他突然站起来把头伸进火线区之内，为这件事父亲责备了他，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我只是想看看我会多么害怕，我想锻炼自己，使自己不胆怯。”

从军校毕业后，巴顿被调往美国第一集团军任骑兵少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顿随约翰·潘兴将军深入墨西哥镇压农民起义军，1917年初以中尉的身份凯旋归来。当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派往法国，在圣米歇尔会战中表现非凡，被提升为上校，同时因为作战英勇和训练坦克部队有功获得嘉奖。

经过4年鏖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参战国人民同庆和平的降临，而将自己与战争融为一体的巴顿却感到生活失去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过半百的巴顿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那好战的心被欧洲的炮火激荡起来，密切注视着战局。1940年他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奉命到本宁堡组建一个坦克旅，不久晋升为准将，并很快成为美军的战车专家，后又升为少将。

1942年11月，在突尼斯境内的美军被德军打得节节败退，士气低落。为鼓舞士气，艾森豪威尔把巴顿调去接管军队。巴顿在短短十几天时间里，就使美军的精神面貌振奋起来。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开始收复失地，而且每战必捷。使巴顿名声大震的是攻占西西里的战役，他指挥部队沿西西里北岸向麦西纳前进，以惊人的速度先于蒙哥马利进入麦西纳并赢得了这一战役。这一战役使同盟国和德军对美军刮目相看。

正当巴顿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之际，却因两次殴打士兵引起美国军内和国内的舆论反对，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保护下才幸免撤职。1944年1月，巴顿前往英国参加诺曼底登陆。盟军登陆后，为了结束缓慢迟滞的推进情况，决定开始发动“眼镜蛇”行动。巴顿又以其惊人的进军速度和勇气把局部性的突破变成了全面的运动战，使盟军终于冲出诺曼底，迫使德军全面撤退。接着，巴顿又率领部队转战欧洲大陆，于1945年3月22日到达莱茵河畔，他当夜就强行渡河，直捣希特勒老巢。巴顿外表豪迈直爽，看似作决定不假思索，实际上他决断前都经过深思熟虑，甚至精确的计算，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他无往而不胜。

巴顿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美国传奇将军。巴顿与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苏联名将瓦杜丁不同，他是在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一次车祸中受重伤不治而逝世的。他未曾听到凯旋时的欢呼，未能接受少女的鲜花，命运却让他与之擦肩而过。

在二战的将军中，巴顿是少有的战争狂热分子，他简直就是为战争而活的。他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与战争相比，人类的一切奋斗都相形见绌！上帝啊！我是多么热爱战争！”另一句著名的话是：“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死是不干净利索的，是一种非军人的死法。但是，对一个只为战争而活的人来说，仗打完后死去，却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

朱 德

1886年12月1日生于中国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朱建德，字玉阶。幼年入私塾。1906年入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中学堂读书。1907年在成都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1908年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1909年在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同年冬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当副目（副班长）、司务长。在此期间，秘密向士兵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同盟会在各地组织起义反对清王朝的情况。同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时任队官（连长），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辛亥革命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军。1912年返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3年——1915年任滇军营长、副团长、团长。在作战中积累了运用游击战术的一些经验。1915年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6年在川南纳溪战役中，以少胜多，显示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1917年升任旅长，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于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先后会见孙中山和陈独秀。同年9月前往德国留学，11月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在格丁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军事，1925年春，曾要求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同年，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7月被驱逐出境，后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在学习期间，曾提出回国后将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

上山”的作战方法。

1926年夏回国，被派往川军，争取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此期间，参与领导反抗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斗争。11月，和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四川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并试图建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1927年初，遵照中共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5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以部分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

1927年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同陈毅率领余部转战闽赣粤边界，到农村找立足点，坚持革命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并对部队进行多次整顿，把一部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基层工作。他领导部队由单纯打仗转变为同时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在军事上开始实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硬打硬拼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他指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1928年1月，同陈毅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遍及十余县的湘南起义，把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武装夺取政权。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三、第七、第四师。同年4月，同陈毅率起义部队和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同党代表毛泽东一起指挥第四军进行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挫败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进剿”和“会剿”。1929年初，他同毛泽东率部向赣南出击，后转入闽西，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他在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订会议决议。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8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同月任红军总司令。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第一方

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1931年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红军的阶级性质、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政治训练等问题，提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一论述对进一步提高红军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同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起，指挥所部以大兵团伏击战法，于黄陂、草台岗等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近三个师，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和周恩来、王稼祥都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朱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先后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维护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1937年6月，兼任军委成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开展军事教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共同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指挥（后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还兼任军委前方分会（后改称华北军

分会)书记。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而后指挥八路军各部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7年10月,经他和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议,恢复了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月,率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1938年4月,同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败日军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指示,命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一一五师一部从太行山区挺进冀南、豫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领导八路军巩固和发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8至1939年间,他先后兼任过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朱德坚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军进行细致的团结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摩擦时,则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朱怀冰部进犯太行抗日根据地,他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进行卫(河)东磁武、涉林等战役,打击石友三、朱怀冰部,对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10月,在延安参与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被选为联盟执行委员,从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1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他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的经验，论述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同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他同毛泽东一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解放了华北、华中等广大地区。

日本投降后，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重大决策。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内战的阴谋，极力主张积极向东北发展，派遣大批部队和干部及早占领东北战略要地。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秋，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10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作用。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此役开创了野战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他总结的石家庄攻坚战经验，在各个战场上迅速推广。1948年5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地区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野战部队，作了重要讲话，对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性起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以后，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1949年5月，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部署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西北地区的重大战役，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

放勋章。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起，还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亲自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并参与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种、兵种的组建工作。他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要求尽快地生产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他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强调实施现代化、正规化的统一训练计划，办好各类、各级军事院校，并曾亲自到军事学院对毕业学员进行监考和考核。他还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1974年，虽已八十八岁高龄，仍亲自视察海军舰艇，并乘舰出海检阅。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受到错误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他进行了抵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善于从实际出发，建设人民军队，决定战略战术。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朱德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朱德选集》（1983年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辑的《朱德军事文选》（1997年出版）。《朱德传》有多种版本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朱德年谱》于1986年出版。

蒙哥马利

1976年3月24日，英国著名的军事家、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英国武装部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在他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

1887年11月17日，蒙哥马利出生在伦敦肯宁登区圣马克教区的一个牧师家庭。少年时他十分顽皮，14岁才正式上学，20岁时考入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官学校，1908年毕业，被分配到驻印度的部队中服役，任少尉排长。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即将结束时任司令部上尉参谋。这段经历对他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回忆说：“到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我已经认清军事职业是一种终身的研究。”他潜心研究战争的科学和实践，终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展雄才。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蒙哥马利体会到军事完全是一种需要毕生精力去探讨的学问，但真正理解这种道理的军官不多。他决心献身于这种行业。1920年，他正式跨进了参谋大学之门，毕业后参加了爱尔兰战争。几年的实践，为蒙哥马利日后任高级指挥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蒙哥马利任第三师师长，率部队赴法国和比利时抗击德军，1942年上半年，英军在远东战场上节节败退，在中东战场上丢城失地。在这危急关头，蒙哥马利被派往北非，出任英国驻北非第8集团军司令。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从事，善于把战略、战术联系起来考虑的军事家，他亲自制订了全歼“非洲军团”的计划，并认真检查每项准备工作。这次作战计划是要骗过德国将领隆美尔，不让他发现英军主动进攻的企图，具体行动就是在阿拉曼南面佯攻，在北面准备真正的进攻。激战前夕，隆美尔加强了对英军阵地的空

中侦察，蒙哥马利指挥第8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一夜之间将所有的战车转移出集结地，换上了逼真的假目标，英军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骗过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阿拉曼决战始于1942年10月23日深夜，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用十几天时间，迫使隆美尔的部队连续后退600多公里，伤亡惨重。德意军死伤和被俘5.9万人，隆美尔的助手冯·托马将军和4名意大利将军也当了俘虏。一度纵横驰骋于北非的“沙漠之狐”隆美尔遭到了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惨败。消息传到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敲响报捷的钟声，阿拉曼大捷扭转了北非战场的危急局势，给英国人民一剂强心剂，蒙哥马利也随之升迁，翌年荣升英国元帅，并受封阿拉曼子爵。正是因为这场战役，这位“沙漠之狐”的征服者蒙哥马利成为举世闻名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阵地战的高手，有点像“拿破仑的终结者”英国惠灵顿公爵。他对作战的目的、步调有极清晰的概念，但也容易固守这个概念不知变通。巴顿在西西里战役中改变计划，冲向巴勒莫，再回身取墨西拿的即兴行动，蒙哥马利和巴顿易地而处是决做不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墨西拿才是整个战役的关键。

蒙哥马利在诺曼底登陆后没有及时占领卡昂城，而是改为“在卡昂附近回旋”，吸引德军主力，以便美军在南翼达成突破。包括巴顿、布莱德雷在内的盟军将领都说，这是蒙哥马利为他无力攻占卡昂所找的借口。在当时，即使蒙哥马利真想占领卡昂，他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他的借口也好，应变计划也好，确实不失为上乘的变招：德军主力和全部的装甲部队都集中在英军周围，从而使美军在7月份发动“眼镜蛇”作战，突破德军防线，达成了突进。蒙哥马利是战略上和阵地战的高手，连隆美尔也承认这一点。

蒙哥马利的问题在于他缺乏把突破变为突进的魄力，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过于谨慎。有时即使有了巨大的优势，他能突破敌人防线，但不能决定性地消灭敌人，而是把敌人向后推。像阿拉曼战役以后，和“市场—花园”作战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与朱可夫无法相比。蒙哥马利长期与巴顿一起作战，巴顿很看不起

蒙哥马利，还经常骂娘。不过蒙哥马利对巴顿本人倒没什么恶意，只是把他们之间的竞争看作是事业上的竞争。

战后，蒙哥马利先出任英军总参谋长，后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他退休之后继续参加国际国内政治活动达 10 年之久，出访了许多国家，广结政界要人。他于 1960 年和 1961 年两次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华西列夫斯基

1942年11月19日晨，浓雾笼罩着斯大林格勒，突然万炮齐鸣，集结在斯大林格勒南北两面的苏军出敌不意地发起了钳形攻势，迅速将33万德军合围，而后至1943年2月2日又将其全歼。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为这一战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苏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付出了大量心血。

华西列夫斯基与朱可夫是同时代的苏军高级指挥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一起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但是两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朱可夫豪爽开朗，大胆果敢，魄力强，华西列夫斯基老练稳重，平易近人。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回到大本营，斯大林开玩笑地说，“瞧您指挥这么一大批部队，而且您干得不坏，但您自己也许连苍蝇都没有欺侮过”。华西列夫斯基一向认为，善于在下属面前保持自重是军事首长不可少的品质。

1895年，华西列夫斯基出生在新戈列奇哈村的一个神甫家庭。母亲共生下八个孩子，华西列夫斯基排行第四。父亲收入微薄，母亲常到临近工场作坊里做些零活补贴家用。华西列夫斯基也常常到菜园和田地里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他先是在诺沃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教会办的一所小学读书，后来进入基涅什马神学校，1909年秋天又进入科斯特罗马神学校读书。这个学校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华西列夫斯基童年时并没有梦想作一个军人，更没有想借此机会飞黄腾达，是战争使他进入军队，成长为著名的军事家、统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打破了他学生时代曾有过的当一个农学家的梦想。1915年，他进入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校速成班，毕业后获准尉军衔，被分配到一个县城的预备营，

不久，即率一个连开赴前线，被编入第9集团军步兵第103师诺沃赫皮奥尔斯克团。

1916年春，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第9集团军，驻扎在从德涅斯特河畔的拉塔奇到普鲁特河上的鲍扬一线。他作为第一连连长，参加了勃鲁西洛夫战役。同年8月，罗马尼亚对奥宣战，却连吃败仗，11月布加勒斯特沦陷。华西列夫斯基随第9集团军开到罗马尼亚，阻止德国人通过罗马尼亚进攻俄国。

1917年3月，国内传出彼得格勒爆发革命的消息，华西列夫斯基所在团的军官开始分化，一部分人更趋于保守，一部分向士兵群众靠拢。他一向很接近士兵群众，自然走了第二条路。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军军官层的分裂加深了，保守分子暂时占了上风。华西列夫斯基因承认苏维埃政权，接触布尔什维克，出席士兵代表会议而遭到一部分军官的冷遇。为此，他决定结束军事生涯，去做一名农学家。

1917年12月，他退伍回到了家乡。

三个星期之后，华西列夫斯基接受了县军事部的建议，担任了基涅什马思乌格列茨克乡的军训处教官。1919年5月，他参加了工农红军，当上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官。此后，他担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教导队长等职。1931年5月，华西列夫斯基被调至工农红军军训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许多军事演习的准备和实施，同时参加了司令部勤务条令和大纵深战斗实施细则的编写，使他学会了参谋业务，积累了工作经验。1934年，他升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军训部长。1935年9月苏军实行军衔制时，他获得上校军衔。1936年秋，改任司令部作战部长。11月，进入总参军事学院深造，一年后以优异成绩结业，到总参谋部任训练处长。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6月，德军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三个月就推进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和罗斯托夫一线。形势十分危险。这时，已升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为稳定战局进行了许多具体的组织计划工作。1942年5月，他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

当时，他正在西南方面军协助工作。最高统帅要求他至迟于7月4日返回大本营。刚刚就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根据统帅部的意图，主持总参谋部拟制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计划和方案，领导解决了各方面军作战中的许多具体问题。7月23日，他作为大本营的代表来到对战局起决定性作用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解除德军对苏第62集团军合围的威胁，他建议使用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的剩余兵力，对敌实施反突击。这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围歼计划，而且阻止了敌人一举拿下斯大林格勒的企图。随后，他协调其他战场，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保证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显示了他统率大军的才能。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派出的代表，先后协助各方面军领导进行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进攻战役、库尔斯克会战、解放顿巴斯战役、克里木的作战行动和白俄罗斯进攻战役等。白俄罗斯战役是苏联卫国战争中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之一。在战役准备阶段，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设想；一方面详尽审阅了被命名为“巴格拉季昂”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帮助大本营完成了各方面军的调动和集中，提出了他认为适合担任新编组各方面军司令的人选，供最高统帅选择。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又深入各部队检查战役准备情况，实施最直接的战役指挥。这次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解放了白俄罗斯全境，为以后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受最高统帅之命，与总参谋部的人员一起拟制了远东作战计划，并采取极严格的保密和伪装措施，将三个方面军调到中苏边境的三个主要突击方向上。7月，他被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指挥对日本关东军作战。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华西列夫斯基指挥150多万苏军发起进攻，进入中国东北等地。仅仅10天，苏军就在三个作战方向上分别挺进了200—800公里，将日军分割成许多孤立的集团。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下旬，关东军陆续被解除武装。华西列夫斯基对这次战役的指挥，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战后，他先后担任总参谋长、武装力量部部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总监等职，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77 年逝世。

朱可夫

朱可夫（1896～1974年），前苏联元帅，苏军著名统帅。1915年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国内战争结束后，历任骑兵团长、旅长、骑兵监助理，骑兵师长，驻西班牙军事顾问，骑兵军长，驻华军事顾问，军区副司令。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指挥苏蒙军反击日军取得胜利。后任军区副司令、司令。1941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苏德战争期间，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和代表，战时最高副统帅、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多次参与制定战略计划，指挥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罗斯、柏林等一系列重要战役，曾代表苏军接受德军投降。战后，任驻德集团军总司令兼苏占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部长。他作风果断，具有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善于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大量兵力，擅长使用坦克兵团，穿插迂回，分割合围。四次荣获苏联民族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6枚。著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

朱可夫实事求是，多谋善断，指挥若定，堪称军事“奇才”。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以闪击战法侵占了苏联大片领土，朱可夫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主张收缩兵力，于7月29日正式提出放弃基辅的建议，结果不仅被斯大林指责为“胡说八道”，而且半小时后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调任新组建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次日，朱可夫即到任，了解情况，着手准备在斯摩棱斯克东南的耶利尼亚地区发动一次进攻战役。这是朱可夫在苏德战争中第一次独立指挥的战略性战役。1941年8月30日至9月8日，他成功地实施了这次进攻战役，彻底铲除了德军在耶利尼亚的突出部，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进

攻，为苏军统帅部在莫斯科方向上改善防御态势，赢得了时间。

1941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德军从西部迂回，直奔莫斯科。10月10日，朱可夫奉命任西方面军司令员，担负保卫莫斯科的重任。朱可夫知己知彼，料定墨守陈规的德军还将采用强攻两翼、分进合击的战法，因此，他格外重视两翼的防守，同时掌握部分兵力在紧急时从正面支援侧翼。11月15日，德军以51个师180万人向莫斯科发起总攻。朱可夫指挥若定，沉着应战，只以一线部队抗击敌军而不动用预备队。守旧的德军果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两翼部队苦战之时，正面的部队却按兵不动，从而使朱可夫得以把正面兵力机动到两翼抗击德军。12月13日，红军击溃德军两翼，使希特勒损兵折将50万人，打破了法西斯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战争进程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基础，朱可夫也从此名扬天下，连和朱可夫打过仗的德国人都承认他是苏俄将领中最大的天才。

1943年3月中旬，朱可夫来到库尔斯克，迅速查明了德军意欲夺占库尔斯克的企图。朱可夫向苏军最高统帅部建议：苏军先不要转入进攻，而以优势兵力进行防御，在阵地上疲惫和消耗敌人，然后投入精锐预备队，转入反攻，最后歼灭德军主力。

1943年7月5日凌晨，朱可夫当机立断，命令苏军炮兵提前对敌实施炮火反攻，迫使德军将发起冲击的时间推迟3小时。德军进攻进展缓慢，不久便转入防御。7月12日，苏军转入反攻，并于8月23日解放哈尔科夫，胜利结束了这次会战，这次会战堪称苏德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点。

1945年春，苏军对德的最后一战开始了。而奉命直捣柏林的正是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

1945年4月16日4时，朱可夫下令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德军发起全面进攻。4月18日晨攻克泽劳弗高地，打开了这把“柏林之锁”。4月20日，突破柏林近郊的德军防线。次日，朱可夫的3个集团军突入了市区。4月30日15时50分，朱可夫下属的两名军士将红旗插到了国会大厦。

朱可夫还以治军严格闻名，特别是对干部的要求更为严格，

这在他戎马生涯的早期就开始表现出来。在他担任团长时，他禁止任何坦克兵穿工作服离开车间、车库和坦克停车场，外出必须穿规定的制服，穿着制服时，必须把铜扣、皮鞋擦得锃亮。野外训练归来，必须立即洗刷战斗车辆。

多谋善断、指挥若定的朱可夫堪称军事奇才，他领导指挥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柏林一系列战役，直接打败了希特勒纳粹集团，是一位战功显赫的二战将领。

刘伯承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中国四川省开县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委委员，任泸州、顺庆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留学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并作军事问题补充报告。1930年夏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在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红5军团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先遣队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2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86年去世，享年94岁。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取得了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长征中，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亲临前线指挥了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诸战斗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在正太路东段，对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之日军实施伏击战，三战三胜，歼敌数千。4月，又粉碎日军对武乡长乐村的9路围攻，连克长治等18座县城，并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大反攻中，他指挥部队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巩固并发展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13个师，接着挥师东进，组织发起平汉战役，歼灭国民党2个军并争取国民党1个军在战场起义，1946年冬，他指挥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等战役，有力地配合全国各战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他与邓小平共率12万部队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9个多旅，协同华东野战军打破了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此后，率师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粟、陈谢两部密切配合，逐鹿中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冬，他与邓小平、陈毅等指挥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在渡江战役后，他进军西南屡建功勋，直至整个西南获得解放。

刘伯承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对中国游击战、运动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述。他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瑰宝。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全力抓住太行山军民战略思想的转变，提高部队对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认识，他首创“游击集团”的人民战争形式，提出“敌退我进”的作战方针，科学地阐述了游与击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融合，适时调整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份量”的重要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解决了集中大军编组野战兵团、战场准备、后勤保障、攻城战斗、以及战役指挥、战术指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使部队较快地从分散的抗日游击战争转向集中的大规模运动战的国内战争，趋利避害、机动歼敌，是刘伯承作战谋略的精华。他认为机动的本质是消灭敌人，只有辩证地处理敌我之间的强弱关系，趋利避害，才能达到机动歼敌的目的。他指出：“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

‘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运动战也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他还提出，大踏步进退是机动的主要形式，必须同敌人展开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提倡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利用敌人机动兵力与守备兵力分散上的矛盾击破敌人。以及各种具体条件下的机动作战等问题。他对机动作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论证，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多方面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他在用兵谋略上，还主张用兵不复和战法创新。同是伏击战，或伏其救者，或伏其退者，或诱伏，或逼伏。同是口袋战术，有时采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时采用“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是围点打援，有假攻势，真打援；有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等。他灵活运用并发展人民军队游击战、运动战的传统战法，总结出“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狼的战术”，“大迂回大包围”等新战法。诸如“吸打援敌”，“回马枪”，“拖刀计”，“猛虎掏心”，“釜底抽薪”，“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歼其退者”，以及“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的“打蛇术”等。他的兵法谋略，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又是对中国古代兵法的批判和继承。

刘伯承是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邓小平曾评价说：“刘伯承的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叶挺

叶挺，字希夷，中国广东省惠阳县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北伐和抗日名将。

叶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富有正义感。上中学时，他最喜欢看张炳麟、邹容的书，这些进步书籍使年轻的叶挺产生了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他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决心学好军事，报效祖国。在这期间，国内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连年混战，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就在这一年，叶挺的母亲病故却无钱埋葬，他的妹妹只能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这一切使叶挺对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统治充满了怨恨。

1918年底，叶挺从学校毕业后去漳州参加了粤军。这时，他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在粤军回师广州攻打军阀莫荣新的战斗中，叶挺英勇杀敌，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率领“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屡立战功，从此名声大振。他率领的“独立团”也因此被称为“铁军”。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德国和法国。抗战爆发后叶挺毅然回国投入到抗日战争中。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力量不断壮大，这使蒋介石非常恐慌，他于1941年1月指使手下制造了皖南事变，叶挺率领的新四军被困在一座山上。当时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决定下山与国民党谈判，结果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逮捕了。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设下种种圈套，软硬兼施，企图让叶挺将军叛变投降。顾祝同首先派副师长威逼叶挺下令让山上所有新四军下山投降，遭到叶挺严厉的斥责。顾祝同见硬的不奏效，马上又来软的。他盛宴款待叶挺，并诱骗叶挺说，只要

他发表一篇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就可以当国民党的副司令。叶挺将军又严词拒绝了。顾祝同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派一个曾经在新四军中担任参谋处长的叛徒来向叶挺劝降。叶挺见到叛徒那副无耻的嘴脸，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猛地站起身，走到叛徒面前给了他几个响亮的耳光，怒骂道：“你满身污臭！滚，马上滚开！”叛徒只好捂着脸羞愧地离开了。顾祝同见无计可施，只好向蒋介石报告了自己的无能。

蒋介石一直都很欣赏叶挺这员大将，他早就想把他拉拢过来，所以决定亲自出马诱降叶挺。蒋介石以为自己一出面，事情就会成功。没想到，叶挺不但没买他的账，而且还当面揭露了蒋介石谋划皖南事变的真相，并要求释放全体新四军战士。蒋介石说服不了叶挺，只好气急败坏地吩咐手下将叶挺押回监狱，严加看管，重刑惩罚。

叶挺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叶挺在狱中作了一首《囚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叶挺在昏黑的监狱里，借着窗口透进来的仅的一束光亮，怀着满腔愤恨，用墨笔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几个大字。这不仅是在告诫敌人，也是在警醒自己。

后来，经过共产党的多方努力，叶挺才得以出狱。他不慕荣华富贵和英勇不屈的精神历来被人们传为佳话。

贺 龙

1896年3月22日生于中国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901年，入本族私塾读书。时常习拳练武。少年时曾与人结伴运盐。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3月与乡邻韦进斋各持一把菜刀率二十一名青年夺占芭茅溪盐局，组织农民武装，打出桑植县讨袁（世凯）护国军旗号，任总指挥。同月，发动湘西五县农民暴动，任湘西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营长。8月，遭敌袭击，部队散失，只身去长沙，易名贺龙。1917年，在长沙因参与推翻湖南督军的活动被捕，后经营救出狱，返回湘西，重新组织武装，曾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任湘西援鄂民军第一路所属部队游击司令。1918年后任湖南靖国军营长、团长等职。1922年率部入四川，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四川“讨贼军”混成旅旅长，与吴佩孚纠合的四川军阀部队作战。1924年返湘，先后任澧州、湘西镇守使。1926年起，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在湖北、河南屡战屡胜，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1日，他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所率第二十军为起义军主力之一。同年9月，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在江西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与周逸群等经上海返回湘西发动并领导武装斗争。1928年7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西（后改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率部与湘、鄂、黔军阀和地主武装作战，在斗争中历经挫折和发展，至1929年夏，初步形成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率部到洪湖，与周逸群等领导的第六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1931年6

月，率第三军（第二军团改编）开辟鄂西北革命根据地。9月率部重回洪湖。1932年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洪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败，他率部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到湘鄂边开展游击战。次年12月，政客熊贡卿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诱降，贺龙向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后，断然将熊公开处决。1935年5月，率部进入川黔边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等地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自1931年底到1934年秋，他曾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肃反”中保护了一批干部，并对所部恢复一度被取消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起了重要作用。

1934年10月，第三军与第六军团在川黔边界的木黄、石梁、南腰界一带会师，第三军恢复第二军团番号，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第二、第六军团。为策应第一方面军长征，贺龙率部向国民党军开展湘西攻势，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同时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主席、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1935年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挥所部进行反“围剿”作战，先在桑植、永顺等地连战连捷，使部队由被动转为主动，后在转向湖北时于宣恩、忠堡、板栗园等地机动歼敌，打破了十一万国民党军的“围剿”，并占领石门、津市、澧州、临澧等城镇。

1935年9月起，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余团兵力“围剿”第二、第六军团，贺龙与任弼时等率部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11月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黔滇边乌蒙山区与敌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五百余公里的大回旋战，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1936年4月率部从滇西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7月，在四川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在此，奉中共中央电令，将第二、第六军团及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会师后，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随后，率部与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在今宁夏的将台堡与第一方面军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与关向应等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忻口作战，在雁门关

等地区主动出击，切断日军的交通线。1938年3月，采取机动灵活、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术，指挥所部击退日伪军万余人向晋西北的进犯，连续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等七县城，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奉命率第一二〇师主力东进冀中，兼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八路军冀中区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一二〇师和冀中第三纵队，打破日军对冀中的多次围攻，指挥齐会和陈庄等战斗，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底，率第一二〇师主力返回晋西北，领导军民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斗争。1940年11月，任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和“蚕食”，使晋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1942年8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工作和财政经济建设，领导军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打破敌人的封锁，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同年8月，指挥所部参加对日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职。1945年10月，率领晋绥野战军，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解放绥东、绥南广大地区。1946年7月，指挥晋北战役，攻克朔县、宁武、繁峙等八城。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他指挥联防军地方兵团积极配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作战，同时，领导发展后备兵团，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战略后方，在困难条件下，集中陕甘宁晋绥人力物力，支持解放西北的作战。

1949年5月，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9年底，率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一部入四川，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西南广大地区。1950年，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统一部署下，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和被俘人员的整编及改造工作，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势。同年10

月，指挥进藏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64年起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强调在军队中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重视战备训练和民兵工作，提倡群众性练兵活动，同时指导军工生产和军事院校工作。从1952年起还兼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坚贞不屈，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终年七十三岁。1975年6月9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叶剑英主持，周恩来讲话。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三号文件，彻底为贺龙平反昭雪。

彭德怀

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原名彭得华，号石穿。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十五岁参加饥民闹灾，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1916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19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1月彭德怀于所在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年1月升任团长，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会师。1929年1月为了配合第五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后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天。同年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任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军团长。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红三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

后率红三军团积极执行新的作战方针。二渡赤水后，回师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协同第一军团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红一、红三军（由军团改军）合编为陕甘支队，任司令员。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他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36年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而后在华北敌后领导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与日军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与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0年，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后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使全国军民受到鼓舞。1942年8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年9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的大反攻。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二十多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二万余人的部队，同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

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向毛泽东提出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的建议，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年2、3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五个旅，于4月22日收复延安。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过程中，指挥第一野战军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七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经过两年边打边谈，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改善武器装备，组建技术兵种，举办各类军事学校和研究机构，实施正规的军政训练，建立第一线国防筑城体系，促进人民解放军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9月底，搬出中南海，到北京西北郊挂甲屯居住，边学习，边劳动。1962年6月，他给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1963年上半年，他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总结毕生军事经验，撰写“军事理论笔记”。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严重迫害，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六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彭德怀的军事论著很多，集中反映在《彭德怀自述》（1981年出版），彭德怀传记组编辑的《彭德怀军事文选》（1988年出版）中。《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彭德怀传》于1993年出版，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于1998年出版。

叶剑英

1897年4月28日生于中国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叶宜伟，字沧白。1902年入钟傲泉私塾读书，后进古玉泉私塾读书。1908年就学于丙村镇三堡学堂。1912年就学于梅县东山中学。1916年在梅县横山新群小学教书。后随父赴南洋谋生，到达马来西亚的怡保。1917年夏回国，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前往福建漳州，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闽”粤军。1920年8月参加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军阀之役。不久，任广东东路讨贼军司令部参谋。1921年10月，随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后任江防舰队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年夏，当投机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时，叶剑英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的作战。10月，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1924年春，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应廖仲恺之邀，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5年2月，陈炯明叛军再次来犯，奉调回第二师参与组织指挥作战，保卫广州，参加第一次东征。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同月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先后兼任第二师独立营营长和新编团团团长，设营于香州，配合黄埔军校培训军士。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北伐。攻克南昌后任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在九江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立即告知叶、贺，并商定对策，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南昌起义后，劝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放弃尾追撤出南昌的起义军。后兼任第四军教导团团团长，率部南下，进入广州，任中共广东省军委委员。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

积极扩充教导团、警卫团等革命武装，为起义创造条件。12月11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1928年冬，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到达上海。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反“围剿”作战的指挥。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长征前，任军委第四局局长。10月，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参加长征。11月，在西延、龙胜山区敌机的一次空袭中负伤。12月，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兼军委第一局局长。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与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了坚决斗争，保证了第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2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同年7月起，到安塞、西安等地，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中的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与周恩来、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同年底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2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1940年3月，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发表《对日作战与摩擦问题》的讲话，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同月，出版《叶剑英抗战言论集》。1941年2月，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11月，兼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1945年，在延安多次接

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和战绩，扩大中国敌后抗战在世界上的影响。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挑起军事冲突。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年2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同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赴晋西北临县地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1948年，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市军管会主任、市长。8月中旬，离北平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0月上旬，参与指挥广东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领导华南军民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城乡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1954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起，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主持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倡导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活动，组织实战演习，参与领导制订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指导全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总结人民解放军建军和作战的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参与制订国防战略方

针。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以后，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工作。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5年，任国防部部长。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届中全会增选）、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副主席。1982年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聂荣臻

1899年12月29日生于中国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1907年入私塾读书，6年后入小学读书。1917年7月毕业于江津县九如镇立高等小学，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读书。1919年，因参加五四运动，支持当地学生爱国斗争，被迫离校。12月，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1月，到达法国，曾先后进蒙塔尔纪中学、德洛中学、胡乃尔中学就读，进蒙塔尔纪橡胶厂、克鲁邹钢铁厂等工厂做工。1921年，参加了“二八运动”、“拒款运动”、“争回里昂中国大学运动”等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2年夏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系。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改变了“工业救国”的想法。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团的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军事。1925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党内职务为黄埔军校党团领导小组成员，并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到广东区委做周恩来的助手。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军委特派员，负责党的联络工作和向各军分配党员干部。10月10日，随北伐军进攻武昌。组建湖北省军委，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1927年7月中旬，武汉国共分裂，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

奎部第二十五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 11 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失败后，转赴香港。同年 12 月 11 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 年 1 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负责训练军事干部和指导两广各地的武装斗争。1930 年 1 月，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 5 月调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 年 1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31 年 4 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协助周恩来紧急搬迁了中央机关和负责人住址。12 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 年 3 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他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意见。同年 4 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1932 年冬以后，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在战斗关键时刻到前沿指挥。长征开始后，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坚决执行军委关于控制九峰山的命令，保障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在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随后和林彪率第一军团翻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打开前进道路。在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到陕北后，率部参加直罗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 年 11 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 115 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林彪一同指挥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一千余人，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1937 年 11 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 3000 人的武装，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在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到 1938 年底，晋察冀边区发展到

七十二个县，曾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在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第二混成旅团一千五百余人，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1940年春，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1941年秋，日军七万余人对北岳、平西地区大举“扫荡”时，指挥主力相继转至外线作战，同时率领党政军机关一万余人，在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掩护下，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围歼晋察冀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袭击和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后，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和“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1943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11日起，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开展对日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陆续抽调大量晋察冀部队和干部支援东北战场。1946年8月，组织大同、集宁战役，歼敌一万二千多人。10月，指挥保卫张家口战役，歼敌一万多人。1947年4月指挥正太战役，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陘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创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12月，以华北部队为主，先后解放新保安、张家口，歼敌七万三千多人。194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指挥平津战役。2月，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员，9月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10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解放东南沿海岛屿、清剿国

民党军残余武装和土匪。参与抗美援朝的组织工作。为人民解放军实行精简整编，组建各军种、兵种领导机构和军事院校，制订军事条令、条例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2月，任全军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分工主管军队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工作。1955年7月，任原子能事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6月，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10月，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1月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五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在研制常规武器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他在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中，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和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调动和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6年9月21日，向叶剑英提议，用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10月6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7月，开始撰写回忆录。8月，写信给中央，提出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8月，写信给党中央，因年高体弱，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1987年11月，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他是十位元帅中最后一位辞世的元帅。

陈 毅

1901年8月26日生于中国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原名陈世俊，字仲弘。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而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担任重庆《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工人、学生运动。1926年初毕业于中法大学文学院，参加领导“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后被派赴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并在合川参与泸州、顺庆（今南充市）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年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他转赴江西，8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任师党代表。同年4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初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主持中共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全面汇报红四军的情况，肯定毛泽东、朱德在红四军中的贡献，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在周恩来主持下，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给

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回红四军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2月任新成立的第六军政治委员。后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四方面军总指挥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斗争，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1935年2月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向分散游击的转变。在敌人的分割、封锁与残酷清剿中，在赣粤边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中共在南方的这个革命战略支撑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抗日战争开始后，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根据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率领第一支队挺进苏南，与第二支队协力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后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继而又率苏南主力部队北渡长江，任苏北指挥部指挥，联络友军和开明绅士，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指挥黄桥战役，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年11月，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等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先后发表了《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等指导部队建设的重要论著。指挥华中九万部队，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坚持抗战，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943年11

月赴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率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五十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向华东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介石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1947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兵团密切协同作战，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5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1949年5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筹建华东空军、上海防空军。同时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与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被誉为中国“元帅外交家”。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他进

行了坚决的斗争。1969年3月起，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召开了二十三次座谈会，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开展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陈毅的军事论著主要集中在1996年出版的《陈毅军事文选》中。另外，他兼资文武，博学多才，还发表过大量的政治、文学论著，尤其擅长诗词。1977年出版《陈毅诗词选集》。《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陈毅传》于1991年出版，《陈毅年谱》于1995年出版。

罗荣桓

1902年11月26日生于中国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原名慎琪。1910年入私塾，1916年夏高小毕业，又在家乡读了三年私塾。1919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1926年秋在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赴广州，旋即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年5月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校支部组织干事，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于9月20日集结在浏阳县文家市，罗荣桓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起义部队后经三湾改编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罗荣桓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连、营、支队党代表。他作为红军第一批连队党代表之一，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参与创建了人民军队的连队政治工作，由此开始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后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930年8月，任第四军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武装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

同年9月，任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第八军团撤销，他先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牛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第一一五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五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部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

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分地区。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率山东主力部队六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曾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

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由于身体原因，1956年9月，他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职务。中共中央于10月同意了他的请求。1959年9月起，中共中央军委分工他主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他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的民兵建设的方向。1960年底，林彪发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批判斗争。随后，毛泽东决定，由罗荣桓复出，再任总政治部主任。20世纪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从1942年起，罗荣桓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坚持工作。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十位元帅中最早去世、寿命最短的一位元帅。

徐向前

1901年11月8日生于中国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原名徐象谦，字子敬。1911年在永安村读私塾，三年后再读高小两年。1917年因贫困失学，在河北省阜平县一家书店（后为杂货店）当学徒。1919年春，考入太原市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学习，在校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3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城太原第四小学和五台县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任教，因秉性刚直，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两次被辞退。1924年5月初，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一期第一队。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11月底毕业后留校任第三期入伍生队第三队副排长、排长。1925年2月至6月，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同年夏天，被派到河南国民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旅司令部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少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7月底，随张发奎部开到九江。南昌起义后，几经波折，奔走武汉、上海找到党组织。9月，在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六联队队长。12月，参加广州起义，率队苦战三昼夜。起义部队在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任第十团党代表。在转往海陆丰地区途中，升任第四师参谋长。1928年6月，任第四师师长，与彭湃等坚持武装斗争。1929年1月，根据东江特委决定，带部分人员撤出海陆丰地区。3月，由九龙到上海。6月11日，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前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

三次“会剿”，歼灭大量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在此期间，总结海陆丰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鄂豫边斗争的经验，与党代表戴克敏等共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以及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游击战术等七项原则，对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30年春，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乘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南段，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第一军与第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第四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率部南下，一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采取集中兵力、围点打援、击敌一路、各个歼灭的方针，半年中组织指挥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歼敌正规部队近四十个团，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红军发展到四万余人。在此期间，对张国焘军事指导的错误和“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第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他指挥部队连续击破了国民党军十万余人的围追堵截，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千辛万苦，行程一千五百余公里，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2月起，根据川陕地区的特点，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伺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连续指挥了反“三路围攻”和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使红军得到很大发展，川陕苏区进入鼎盛时期。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二十多万人的“六路围攻”，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取得歼敌一万余

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春，指挥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月，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被增补为第六届中央委员，并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五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道。同年9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在中共中央和第一、第三军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年7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伺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西路军浴血奋战四个多月，歼敌二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他历经艰险，于1937年6月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率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扩大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同年6月到达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1年7月，写出

《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一文。10月，发起成立延安黄埔同学会，当选为理事。1942年5月13日，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3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8月，担任抗大总学习委员会书记，领导整风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3月至5月，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月至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六万兵力歼国民党军十万余人，解放县城十四座。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1949年7月25日，当选为第十八兵团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军委分工主管空军和国土防空工作。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与刘伯承共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军及民兵工作。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1967年1月12日，任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2月，与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批判。之后，三次被抄家。9月，给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请求免除全军“文革组长”职务。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组成国际形势研究组，几次开会讨论，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写出《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等有重要价值的报告，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8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79年2月，参与决策和指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83年6月至1988年4

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届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临终留下遗嘱，骨灰撒到他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陈 赓

陈赓，原名陈庶康，1903年2月生于中国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参加爱国活动。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等战役。

1926年陈赓赴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在贺龙部任营长。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苏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团长、师长。翌年因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曾向鲁迅介绍鄂豫皖红军斗争事迹。1933年3月被捕，严正拒绝蒋介石的诱降。经营救脱险后到中央苏区，任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在红军长征中，陈赓任干部团团长，曾率干部团一部抢占绞平渡，使第一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到达陕北后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诸战役。1937年2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任第一队队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率部开赴太行山区，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指挥，继而又转战平汉铁路中段、鲁西北和冀南平原。1940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翌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1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太岳纵队参加上党战役。1946年7月后，率太岳军区部队转战晋东南，六战六捷，在临汾、浮山地区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第一旅。1947年8月与谢富治率领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强渡黄河，进军豫西，开辟豫陕鄂解放

区，配合刘邓和陈粟野战军，在中原地区进行战略进攻。淮海战役中，率第四纵队，协同友邻部队在徐州以南切断津浦铁路，参加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所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执行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入粤追歼逃敌，直插雷州半岛，切断白崇禧部海上退路，协同兄弟部队进行粤桂边战役。继又西进千里，直抵云南边陲，指挥滇南战役，消灭企图逃出国境的国民党军2万余人。

1950年2月，陈赓率部进驻昆明，先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1950年7月应邀赴越南民主共和国，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取得边界战役胜利。

1951年，陈赓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1952年6月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8年9月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0年初，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会晤，就当时国际形势和越南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商定首先发动一个边界战役打开局面，开辟从越南通往广西的交通线。我党中央决定派陈赓为代表，协助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组织边界战役，统一处理有关中国对越南军事援助的各项问题；接着，应越南要求，中共中央又派出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协助军事工作。

边界，战役之前，越南抗战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从全国土地面积看。解放区已占一半，双方拉锯的游击区约占2/5，敌占区户有1/10左右。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法军还占优势。许多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还在敌人控制下，解放区被分割成互不相连的若干片；南部平原有几块小解放区，中部山区有两块狭长的根据地越北山区是面积最大的中央根据地，和中国边境相邻，但被敌人严密封锁着，法军不断对它进攻。这块中央根据地

只有100多万人口，却要养活近20万军队和干部。每年二三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要上山采集木薯、野菜、野果维持生活，加上疟疾的流行，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健康，越南民主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50年7月7日，陈赓率领一个由政治、军事和后勤干部十余人组成的工作组，还有一个警卫连和电台及其他人员，从昆明出发，穿过越南和越北的高山密林，前往越共中央所在地——太原省。

那时正是雨季，山间小路，崎岖泥泞，行军十分困难。陈赓拖着伤残的两腿，忍着入越途中发作起来的牙痛，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一路上谈笑自若。他坚持调查研究，注意观察群众生活，认真听取越方干部汇报，尽量掌握有关越军发展史、当前越南战场形势和法、越两军战斗力的材料。

根据越方干部介绍，法军当时的战略意图是：巩固南部的占领区；维持中部几个较大据点，集中一半兵力在北部“围剿”越军主力。它首先加强越中边界的防御体系，作为封锁越南、“阻挡共产主义势力南下”的国际防线；同时，建立一条自海防经过河内、山西、和平直伸到老挝边界的東西走廊，形成南北包围夹击越北中央根据地的局势。他们对人口众多，盛产粮食的北部平原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夺粮抢牛，毁坏庄稼，切断越北山区的粮源和兵源，企图在经济上困死中央根据地的革命军民，扼杀年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当时，越南武装力量分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主力部队总数已有相当数量，虽有师、团、营、连的编制，但除在中国整训和装备的一个师和二一个独立团之外，其余仍以连和营为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活动，基本上还是一些游击队。法军也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只是在重要据点或遇有重大情况，才临时组织指挥部队，调集几个营在一起打仗，有时集中部分机动兵力，对解放区发动重点“扫荡”；有时投下伞兵，突然袭击丛林中的越南军政首脑机关。越北的敌军，一个排还敢驻扎在一些孤立据点。敌机白天在解放区低空盘旋，猖狂地追赶、扫射公路上的行

人。

陈赓了解法越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后，便反复琢磨怎样在这个基础上，帮助越南人民军打开一个新局面。

7月27日，陈赓一行到达越共中央驻地，会见了胡志明主席。当天晚上，胡志明就和陈赓一起研究边界战役的作战方针。经过商谈，胡志明和越共中央接受了陈赓提出的建议，主要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改变越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争取完全主动，先打敌人的一些较小的据点，以取得胜利，积累经验，锻炼部队，提高士气，再逐渐进入大规模作战，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在野战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机动部队，最后才能拿下高平、谅山等较大的据点。

7月31日，陈赓离开太原市，前往高平附近的广渊，问越南总部和韦国清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会合，一起制定战役作战计划。

当时，越南东北边界地区敌军共有13个营约11000人的兵力，布置在第四号公路北自高平南至谅山的一条线上。越军集中兵力两万多，其中包括中央根据地的大部分战略机动部队，准备作战。

陈赓提出以下的战役指导原则：一、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三、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四、围点打援，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五、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六、争取首战必胜。

具体作战部署是：用两个主力团首先进攻第四号公路上的东溪据点，从中间突破，三个主力团准备打援；派两个营到七溪以南阻击谅山方面的援兵，留少量地方部队围困和监视高平的敌人。如果七溪之敌出援，就在地形有利的地域歼灭之，然后进占七溪；如果七溪守敌不出援，就在东溪战斗解决后，乘胜全力聚歼之。最后以全部主力进攻高平，也力求诱敌出援，在野战中歼灭之。整个战役预计30—40天完成。

在考虑作战计划和整个战斗过程中，陈赓都及时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毛泽东十分重视越北边界战役，亲自审阅陈赓的来

电，并几次代军委起草复电。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局的演变，完全按照毛泽东预料的情况发展。陈赓胸有成竹，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越军总部把战役作战计划下达后，各级干部议论纷纷，有许多思想顾虑。陈赓通过个别谈话和应邀对团以上干部作报告的形式，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有人提出，我们的力量有限，一开始就应当集中兵力消灭高平之敌。这样打，虽然可能牺牲较大，但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先打东溪、七溪，再打高平，那时我们的力量已经消耗了不少，恐怕不一定能够完成解放高平、突破法军边界封锁线的任务。

陈赓指出，想解放高平，首先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否则即使能够勉强攻下高平，也巩固不了。进攻东溪比进攻高平容易得多，胜利比较有把握，而首战胜利，对整个战役影响很大。我们在东溪把敌人打痛，七溪、谅山之敌可能前来增援，就给我军提供在野战中歼敌的好机会。当然在作战过程中我军也会消耗一部分力量，只要有计划地准备补充，我军将是越打越强，而不是越打越弱。

还有人提出，一开始就突然进攻高平，敌人没有准备，来不及增援，如果先打东溪、七溪，敌人就会加强高平据点的工事和兵力，增加我们进攻的困难。

陈赓说，高平三面环江，背靠大山，工事比较坚固，守敌多。进攻高平要渡江作战，而且只能从一面进攻。这样，既要打纵深，还要准备打增援的伞兵，我军缺乏攻坚战斗的经验，困难很多。乘敌不备，突然进攻，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解决我们在战术上和技术上的全部困难。如果先在东溪和七溪消灭东北边界地区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高平之敌陷于孤立，军心动摇。而我军则屡战屡胜，战斗经验多了，胜利信心更足了，那时再打高平，就不会是更加困难，而是更加容易。

有人说，我们没有连续作战的经验，体力又不好，连打几仗，恐怕坚持不下来。

陈赓说，既然如此，就更不应该先啃硬骨头，而要先进攻敌人比较弱的据点。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强的也就变弱了，部队没有连续作战经验，体力差，解决的办法是改善伙食，以及在战斗实践中加强锻炼。

陈赓善于抓重点、抓关键问题。关键的问题他都是亲自抓，亲自处理。他精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一次陈赓针对越军干部的思想顾虑，通俗、具体、透彻地阐明了边界战役的指导原则，许多听报告的同志都说，陈赓给他们上了一堂精辟而生动的军事辩证法课，很解决问题。

9月中旬，部队政治动员和后勤准备工作基本完成。16日拂晓，越南人民军向东溪附近几个外围据点发起进攻，边界战役从此开始。当天黄昏，越南人民军以两个团加两个步兵营和3个炮兵营的兵力，联合进攻东溪。午夜，前线指挥部来电话说，我军已攻进市区，战斗即将结束。后来又说主要阵地未得手，天亮前已撤出战斗。

17日上午，陈赓亲自去越南人民军总部，帮助寻找16日晚部队攻不进去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各级指挥都不敢靠前，通讯联络又组织得不好。尔后要求他们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17日黄昏，越军第二次向东溪发动攻击，并根据陈赓的建议把进攻重点放在北面和南面，18日晨3时，突袭敌军大营，最后全部歼灭东溪守敌。

东溪首战告捷，意义重大，极大鼓舞了越南军民的士气。

麦克阿瑟

在二战中，获得过美国五星上将军衔的只有 3 个人：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在他们之中，马歇尔没有实战指挥经历，艾森豪威尔直接指挥的战役也不太多，惟有麦克阿瑟可说是久经沙场。

麦克阿瑟出身将门，父亲老麦克阿瑟是 1898 年美西战争中的名将，曾任驻菲律宾军事总督。一战前后好几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都是他的门生，这让小麦克阿瑟在仕途上得益不少。麦克阿瑟本人少年早慧，在西点军校的 4 年里有 3 年名列第一，毕业的时候还是学员队长。据说西点军校校史上毕业时既是第一名，又是学员队长的，只有 3 人而已，一个是麦克阿瑟，还有一位没有在军界闯出名堂，再一位就是南北战争时的南方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李也是被美国人视为军事天才的人。大多数名将早年在军校的成绩都不怎么样，少年早慧的也不多，这也使麦克阿瑟成为了一个异数。

军校毕业后，麦克阿瑟被派往菲律宾服役。但不久，便被调回华盛顿，先后在罗斯福手下和作战部任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率“彩虹”师赴法参战，因作战勇敢、屡建战功而不断升迁，一战结束时他已是一名准将。战后麦克阿瑟回西点军校担任校长，成为西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长。1930 - 1935 年，麦克阿瑟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届满后被派往菲律宾任陆军元帅。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率军与澳大利亚准备战略性反攻，担任太平洋西南地区总指挥。后来率军攻入日本，接受日本投降，被任命为盟国最高统帅，全权统辖和改造日本。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又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组织了大胆的仁川登陆计划。后因与杜鲁门总统在侵朝战争问题上意见分歧，

于1951年被解职，后来他任过兰德公司的董事长，1964年病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担任太平洋西南地区总司令。他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概念是，应该使用由舰队支援的空、地打击力量出其不意地对几个主要目标实施大规模攻击。麦克阿瑟的战略是，应该把灵活与节约兵力结合起来，在他的部队不脱离己方的空中掩护之下，沿着前进的轴心线，向几个重要目标外围作跳跃进攻。从广义上讲，他谋求用突破敌人内部防线的方法来割裂并摧毁所谓的“大东亚——南海日本帝国”。正是由于缺乏同日本正面作战的设施，他建议对日本的坚强据点不做正面攻击。对每一次战斗，他所谋求的是获得时机迂回到敌人后方，打击其侧翼，切断敌人的补给线。麦克阿瑟的整个作战理论是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消耗人力的正面攻击，回到拿破仑时代的机动作战。麦克阿瑟采用这一战略，借助海空军力量，运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越过不重要的岛屿，向深远纵深的主要目标实施“蛙跳”攻击，从澳大利亚经菲律宾一直打到日本国土，创造了无数个大步跨跃岛屿的胜利战例。麦克阿瑟的这一战略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避强击弱的规避战术使美军重创日军，而自己的损失却不大。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侵朝军总司令，负责援救朝鲜李承晚政权事宜。南朝鲜的美韩残军希望迅速得到麦克阿瑟的增援，麦克阿瑟则考虑得更远，他计划率领军队在汉城附近的港口城市仁川登陆，以拦腰切断北朝鲜军队的供给线，给北朝鲜军队以致命打击。美军中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军官及参谋人员都反对这一计划，当地的驻军司令也表示反对。但是麦克阿瑟凭借其超常思维拒绝了将领们的反对意见，并且将进攻日选择在英法七年战争时期魁北克战役191周年纪念日，即1950年9月13日这一天。他声称，当年英军将领沃尔夫认为，既然陆、海将军们都认定他的计划不可行，那么蒙卡姆（法军将领）也一定认为他不会那么干。现在，既然美军军官都认为仁川登陆不可行，毫无疑问，北朝鲜人也一定会那么想。为了达成登陆的突然性，麦克阿瑟指挥航母分别对南朝鲜东海岸的三陟和平壤外港镇

南浦及清川江口的达阳岛进行佯攻，在群山方向实施佯动登陆，同时利用报刊、广播散布假情报，造成在东海岸登陆的假象。他自己则率 10 艘军舰驶进仁川港，稍费力气便登了陆，然后长驱直入，扑向汉城，粉碎了北朝鲜军队对釜山的包围，迫使其重兵撤回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又赢得了美军史上一次罕见的胜利。

麦克阿瑟的军事才华集中体现在一个“奇”字，出奇制胜是他成功战例的特点。太平洋战争中，“跳岛作战”是他的拿手好戏，这反映了他在战略概念上的冒险和创新。“跳岛作战”能充分发挥己方的海空机动优势，既减少伤亡，又让大批日军无用武之地，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可以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则是麦克阿瑟在战役层次上指挥艺术的巅峰之作。

除了军事指挥艺术，麦克阿瑟还是出色的教育家和军人政治家。他在 20 年代是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他担任校长时正是西点军校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他给军校带来的活力和进行的教育改革到现在还有深远影响。日本投降以后，麦克阿瑟作为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实际是日本的太上皇。他对日本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从选举权到新宪法。虽然此人反共而且改造的是中国的世仇日本，单就他的工作而言，必须承认他是个出色的政治家。

麦克阿瑟的弱点也和他的天才一样明显。他打过不少本可以避免的败仗，像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的空军被日军奇袭毁在地面上，像朝鲜战争第一和第二次战役。麦克阿瑟过于自信，自信到狂妄的地步，所以往往轻视对手，所有这些败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轻敌。反过来，他开始重视对手时，往往又有天外飞仙似的妙手出现。他的出身、教育、经历决定了他的优越感和自信，他对荣誉有中世纪骑士式的渴望。麦克阿瑟是美军将领中获得勋章最多的一人，也不吝惜给手下的人以荣誉。在他的回忆录中每次作战之后都有长长的注解“我按以下的顺序嘉奖我的部下”，这在所有将领的回忆录中绝无仅有。以上这些都造成了他的个性弱点，进而影响他的判断力。